



品芳照相馆创建于1914年，人像照、全家福、大型团体会议照品牌流芳，2020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大兴蜂业由土作坊传承120年，蜂产品出口日本、东南亚、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2年第7期(总第357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 菲 杨 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 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 伟 陈红英

徐 莉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 濛

编 辑：严 濂 郑雅飞

特 约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老字号脉

4 品芳，为武汉人守住那份记忆 / 于 刚

8 大兴蜂业，酿造甜蜜的事业 / 黄朝阳

九城同心

12 潜江历史文化简介 / 余晓勤

14 闪耀华夏的潜江李氏两兄弟 / 别国庆

19 潜江虾稻正年轻 / 王秋高

三镇拾遗

24 清末民初积玉桥 / 孙庆力

27 我家曾在宗关住 / 郭 迅

委员天地

30 半生书香牵系“三世”政协情缘 / 卢 纲

34 让书籍成为委员进步的阶梯 / 万 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人物春秋

- 37 从哈尔滨南下到武汉 / 佟 心

史海钩沉

- 42 武汉抗战孩子剧团拾零 / 王豫丰 吴文俊
47 《围垦生活》再现东西湖围垦工程 / 王弘宇

山有赏门

- 51 裴传雯教授的“那一句” / 周希正

商聚汉皋

- 56 大武汉让我们不负年华 / 于天宝

都市史话

- 60 汉口西商跑马场图史 / 侯红志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品芳，为武汉人守住那份记忆

◇ 于 刚

照相是一个特殊的商业门类，它给顾客提供的是技术性服务，留下的虽是一张照片，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美好记忆，记录着人生经历的精彩瞬间，让人难以忘怀。

在武汉，人们常说，几乎每家都有品芳拍的照片。确实，品芳名不虚传，荣幸地见证着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一个个家庭的团聚、一点点社会的进步。

品芳照相馆自1914年创立，成为三镇无人不晓的品牌，离不开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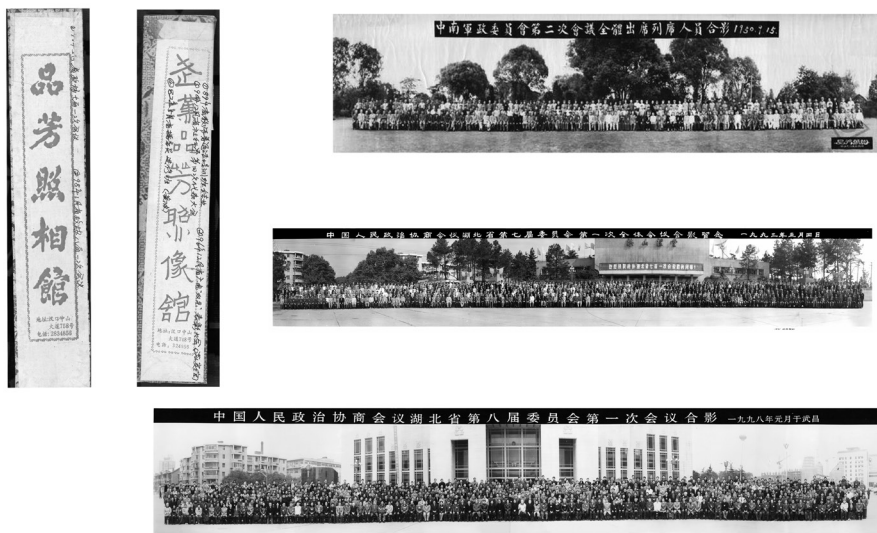
创始人起步严把三关

第一代创始人李炳声，他的特点是严把质量关，硬是靠过硬技术和良好口碑，一个外行人创立了品芳。

李炳声是武昌县（今江夏区）人，随父亲来汉口，先在一家印字馆当学徒。1914年，25岁的李炳声开办品芳照相馆，店子在汉口最早的商圈中心——中山大道民生路旁。

品芳一楼为接待店堂，楼上为三个照场：二楼照场接待一般顾客，设有普通茶点；三楼高级照场接待巨商富贾、军政要员，设有上等茶点和盖碗茶；四楼大型照场专供团体照服务。每天早上店堂大扫除一次，环境干净整齐，工作程序有条不紊。

李炳声的经营管理“三板斧”：第一严把相片质量关，每天最早来店，从一楼检查到四楼，每道工序都要过问，发现有问题的照片，马上重新修整，并将责任追究到人；第二严把服务质量关，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发现职工与顾客吵架，轻则批评，重则解雇；



品芳照相馆的会议团体合影

第三严把经营诚信关，遵守信用，不误约定的取像时间。

与此同时，李炳声重视职工的福利待遇，一日三餐免费，提供宿舍免费。他还担任普爱医院的理事，每年捐一笔钱给医院，职工享受免费看病的待遇。因此，职工没有了后顾之忧，安心从业，干得起劲，如老工人郭明富、熊家朴从13岁进店，一直到解放后退休。

后继者接力勇于跨越

品芳第二代是冯南山、郭明富等学徒出身的师傅，凭借扎实的技艺、丰富的经验，更加壮大了技术力量，奠定了品芳在业内技术领先的基础。

1956年8月，品芳实行公私合营，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李炳声作为私方主任参与经营管理，传统的技术和严格的管理得以延续，而服务群体和经营范围更加扩展，逐渐成为一家综合性大型照相馆。

到了第三代，品芳聚集了杨永洲、肖庆云、王义礼、叶振光、李天佑等一批高级技师。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创新，依技术传承，靠质量取胜，全家福、人像照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大型团体会议照省内首屈一指，服务对象涵盖普通市民、大型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团体。

这一时期，品芳率先实现了从黑白照相到彩色摄影的跨越，前期摄影和后期制作齐头并进，无愧为武汉照相业的领衔名店。

第四代冲刺全国第七

第四代掌门人叶祥鼎，更是将品芳带入了巅峰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进步和经济发展，品芳迎来了“高光时刻”：人像摄影品牌备受社会各界推崇，大型团体会议照和产品照首选品芳，文艺团体的剧照指定品芳摄影师担纲，市民的全家福和生日艺术照也会来品芳满足心愿。

品芳全盛时期的技术掌门人叶祥鼎，是武汉照相业的首批科班生，荣获“中国摄影大师”称号。他1966年毕业于武汉市服务学校（现武汉商业服务学院）摄影专业，1980年成为全国首批高级技师培训班学员，1989年又获得全国首批高级技术职称。

叶祥鼎对摄影艺术一腔热爱，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品芳从学徒做起，在



1925年品芳人像照

这家老店刻苦钻研。更可贵的是，他活学活用善于创新，把前辈老师傅口口相传的技艺与现代摄影理论相结合，融汇成独具一格的“小面点神，显质用光法”——拍摄人物肖像时，侧面用光，点亮眼神，凸显人物气质。

可贵的是，叶祥鼎对独家技艺绝不保守，毫无保留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和培训教学，大大提高了年轻员工的技术水平，培养出王福成、吴伟、徐建华、贺家文和我等一批拔尖人才。1983年以来，每年省市的职业技能比赛和摄影比赛，品芳都是技压群芳名列前茅。

技术创新带来思路开拓，经营改革更是层出不穷：在湖北省开创室内婚纱摄影先河，前来拍照的新人从门口排队到四楼，每天达到100多对；创新虚实结合的背景，打破了室内人像背景局限于平面的传统；首家引进全套进口彩色冲印设备，形成了彩色摄影冲印一条龙服务；在著名旅游名胜九宫山设点，将室外人像和风景人像纳入经营范围等。

1983年，为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商业部以品芳为依托，投资50万成立中国饮食

服务公司武汉照相技术培训中心，面向全国招生。教师都是经过选拔的业内高级技师，品芳的李天佑、叶祥鼎、叶振光、朱幼生等都在其中。品芳的摄影棚和车间就是学员的实习地，学员都是华中地区各省市照相业遴选出来的骨干。培训总共13届，培养技师500余名，为照相业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

品芳集经营、教学、科研为一体，行业地位在全省稳居第一，跻身全国前十，业内评价为“全省第一、全国第七”。

第五代保持领跑地位

第五代的代表人物王福成、吴伟、余万业等，传承品芳的高超技艺，续写品芳的奋进传奇，激发创新精神，在全省独家引进大型彩色转机拍摄技术，走出了大型团体合影的“黑白时代”。

1993年，成立了解放公园自然景婚纱城，全省首开户外婚纱摄影基地。单独设立器材经营部，经营各类照相器材，全面为消费者服务。更加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保持行业的领跑地位。

1997年，品芳引入承包机制，划分为人像部、婚纱部、扩印部、器材部、自然景婚纱城五大块，由职工承包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的初衷，为的是打破大锅饭，调动积极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削弱了整体竞争力。恰逢此时，大小影楼雨后春笋，台资影楼带来面目一新的消费观念，给传统照相业很大冲击，许多老照相馆支撑不住纷纷关门。

品芳作为传统照相业代表，承受着抗衡现代营销模式的压力，由于缺乏整合的力量，又未能及时转型，失去了抢占市场的先机。虽然民生路总店和解放公园分店仍在经

营，但往日风光难寻，以技术见长的品芳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努力求变。

第六代坚守百年品牌

品芳第六代守业者，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可我们顺应时代趋势迎难而上，在保持品芳传统人像特点的同时，紧跟数码化改革扬长避短，立志守住这块传承百年的品牌。

2002年4月，作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批，品芳改制为武汉品芳影像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员工买断离开。2003年11月，中山大道民生路片拆迁，经营89年的品芳总店，因职工意见不大统一，未能重新选址而停业。品芳只剩解放公园一家店，我作为原承包人继续经营，由解放公园一号门迁至解放公园路30号。

百年品芳历经沧桑，几度变迁初心不改，仍由多位老职工经营，立志不让武汉人忘记这个老字号。为扩大品芳的影响力，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平安保险武汉公司达成深度合作计划，与卓尔集团合作开设汉口镇品芳体验店。同时，坚持为原品芳职工自谋出路散布湖北各地的工作室、门店提供技术指导。

国家特级摄影大师叶祥鼎任技术顾问，保持品芳综合性经营的特色，传承品芳人像“五光三调”（高调、中间调、低调，正面光、前侧光、侧光、逆光和侧逆光）的特点，发扬品芳大型团体摄影的技术优势。

由叶祥鼎大师带领的团队，坚守品芳“技术为本”的理念，囊括10多名经验丰富的国家级、省级技师，多次执拍大型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任务，是中央领导来汉视察首选的摄影服务团队。

品芳的人像摄影师，在数码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在熟练运用数码技术的同时，坚持运用光线、构图等传统拍摄技巧，强调个性化，追求商业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巧妙融合，作品仍然深受消费者喜爱。2011年，在湖北省第三届技能状元选拔赛中，品芳不仅获得团体金奖的佳绩，陈军惠、徐寅分获摄影状元和巾帼英雄奖。2020年，在湖北省技能大赛中，摄影类也由杨向东夺冠。

品芳引进数码摄影技术设备，招纳年轻人才加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服务活动。2006年为武汉市残疾人大型集体婚典精品服务，我因此获得武汉市“助残爱心先生”称号。2020年投身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行动，为援鄂医疗队拍摄留影，为不幸去世的市民免费制作遗照等，受到社会好评。

品芳创立已有108年，从黑白照相到彩色摄影，从传统肖像到现代婚纱，从玻璃底板到数码科技，始终走在创新和追求的路上。多名摄影师荣获“中国摄影大师”称号，多人多次斩获全国人像摄影大赛金奖银奖。企业获得“十佳影楼”“消费者信任品牌”“最具影响力品牌”等多种称号，2017年认定为“武汉老字号”，2020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身处大好时代的品芳人，更有信心将品芳传统与时尚更好融合，让老字号焕发出新光彩。

品芳——武汉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一个让你回忆童年、回味青春、回顾成长、畅想幸福的地方。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品芳仍在坚守，为武汉人守住那份记忆，守住那份初心，守住幸福开始的地方。

于刚，品芳照相馆经理、第六代传承人代表、国家级摄影师

大兴蜂业，酿造甜蜜的事业

◇ 黄朝阳

放蜂人办起土作坊

“大兴蜂业”起源于18世纪乾隆年间的“大兴蜜坊”。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品尝了“大兴蜜坊”的蜂蜜后连声称赞，使之名声鹊起。

我祖辈是养蜂世家，以养蜂维持生活。放蜂人逐花而居，与蜜蜂为伴，也与蛇虫为伍，过着游牧式生活。这是最辛苦的工作，奔波几百天，辗转几百里。天地之大，他们将甜蜜采撷，也将自己的生活交给了荒山田野。平均一个月就要搬一次家，每年都要跑遍大半个中国，风餐露宿，人在哪，家就在哪。

蜜蜂和人的生物钟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不让蜜蜂离巢走失，通常要带着蜜蜂颠簸行进在午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让蜂农成为比普通农民还要辛

苦的职业。有诗句这样描述养蜂人：“只能不停地迁徙，去守住下一片初晴花季。”

进入20世纪，我爷爷黄少云在古镇龙丘（现新洲区三店街）创办“大兴蜜铺”。解放后的1952年，爷爷又萌发了由养蜂到加工蜂蜜的念头，采用传统工艺，开办起蜂蜜加工作坊，蜂产品命名为“武兴”牌。

加工作坊历经波折，等来改革开放的春雷震响大地。我叔叔黄建发肩负起养蜂世家的传承使命，决心结束一家子养蜂采蜜的奔波生活，去江苏、浙江蜂产品加工行业学习考察，结合本地蜜源优势和养蜂经验，说服家族兄妹四人合伙创办了蜂产品加工厂，化解本地蜜源销售难的问题。

说干就干，一家子分工明确，从人员组织、资金筹措、厂房租借到设备购置、技术操作、产品销售有条不紊，一个拥有10多名员工、近200平方米的蜂产品加工厂正式建成。

新模式广纳放蜂人

办厂的头两年，每年收购加工蜂蜜二三百吨，周边的蜂农不再为销路发愁，厂里也有了经济效益。又经过几年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叔叔深感小作坊式的企业，不能满足蜂农和大市场的需求，必须走规范化、现代化管理的发展道路。1996年5月，正式组建成立股份制民营企业——武汉市大兴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自此，大兴蜂业迈入新征途，开启新篇章。

新公司成立后，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一度受资金困扰。叔叔积极号召股东找亲朋好友，南来北往，东拼西凑，其真情所至，得到借方的理解与支持。但由于市场原因，蜂产品的销售受阻，公司有两年出现产品滞销和经营亏损，由此十分困惑茫然。

我叔叔一边安慰股东，一边同大家分析受阻原因，商量解决办法。他千方百计与国内知名蜂产品科研机构及有关专家联系，不厌其烦上门求教，高薪聘请专家及企业高管来公司帮助攻克难关，使产品质量向国际标准迈进，企业发展蒸蒸日上。

公司的技术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但蜂蜜的产量不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喝上更好、更纯正的蜂蜜，我叔叔走遍大江南北，问计各地蜂农，寻求与更多优质养蜂人合作，建立“公司（工厂）+合作社+蜂场+蜂农”的模式合作共赢，发展蜂农4600多户，产量得到稳步提升。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我叔叔广纳人才，在用人留



2017年大兴蜂业参展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

人育人三个方面，坚持“人才就是生产力，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的理念，从不论资排辈，大胆起用新人。在用人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激励人才的措施，包括设立项目开发奖、产品创意奖，组织国内外考察交流、定期培训等。在留人方面，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通过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让人才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使企业发展步伐稳健迅速。在育人方面，我叔叔极力建议公司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与专门培训机构建立联系，通过内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分层次对员工进行定期、定时培训，让员工在工作中提升、在培训中提高，使企业人才队伍能可持续发展。

小蜂业走向大世界

我们从1996年开始做蜂产品出口，主要出口日本、东南亚和欧洲，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蜂产品出口的民营企业。因为资历老、质量好、口碑佳，企业推选为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蜂产品分会第九届理监事会副理事长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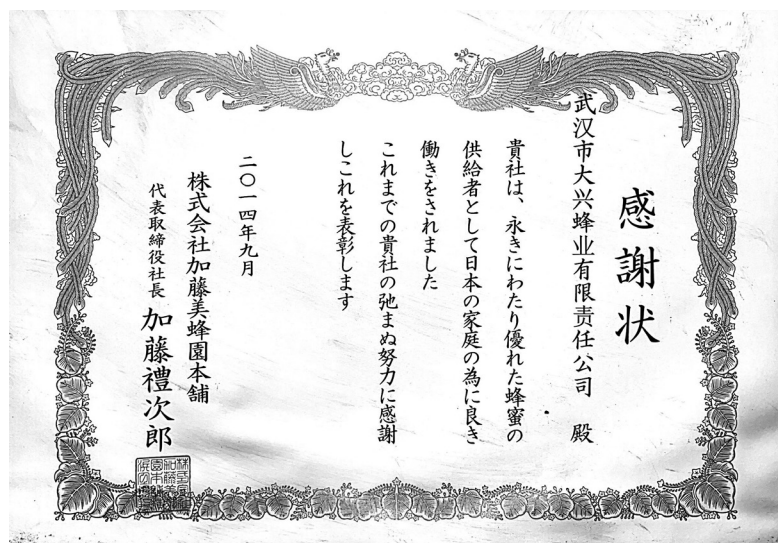
我们与日本株式会社加藤美蜂园的合作长达 20 余年，最初在广交会相识，后由日本方面派代表来蜂场考察参观，带走样品进行质量检测，最终达成长期合作。日本公司对于蜂蜜的源头和产地有严格要求，对蜂蜜的颜色和口感也有具体规定。日本客户更喜欢颜色偏浅、口味偏淡的蜂蜜。针对他们的要求和喜好，我们特意研发了一款以油菜和洋槐为源头，经过加工调和而成的白色蜂蜜，定名为“白蜜”。这款产品深受日本客户喜爱，2014 年 9 月我们收到过加藤美蜂园的感谢状。

东南亚客户以新加坡为主，客户要求和日本大体相似。

欧洲客户主要是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相较于亚洲客户，欧洲客户更注重蜂产品的新鲜度，需要采用当季的蜂蜜，尽快加工，尽快交货。另外，欧洲客户对蜂蜜生产过程有严格规定，明确要求加工温度不能超过 48℃，且必须存放在恒温仓库。根据要求，我们对蜂蜜的生产和存储环境，作出相应调整和改善，以保证蜂蜜的出口质量。在运输上以海运为主，由阳逻港统一安排出口。

加速器推进高科技

经过 120 年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和同舟共济，当年一家不起眼的土作坊，已是一家集养蜂、科研、加工、营销于一体的外贸型、高新技术综合性企业。目前，下设蜂产品加工厂、直属养蜂场、跨区域协作性养蜂合作



2014 年日本加藤美蜂园的感谢状

社、产品开发部、营销部等，年加工能力 2 万吨，年产值近 1.2 亿元，其中出口创汇近 1000 万美元。

大兴蜂业拥有多台国内外先进检测和生产设备，并配备相应食品指标检测检验设备和仪器，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认证、SC 认证等，拥有外贸自营进出口权。生产的各种蜂蜜产品，辐射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畅销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武兴”牌商标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品牌口碑，2011 年以来相继评为“湖北省著名商标”“湖北名牌产品”。公司 2011 年首批认定为“武汉老字号”，2021 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在发展历程中，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始终注重打造自主品牌，制订详细的品牌发展规划，从产品、包装到服务、宣传等各方面都精心打造。在内部经营管理上，按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积极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大兴蜂业积累了 10 多年蜂产品研发经验，是市级企业研发中心，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我们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科技开发体系，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 4% 以上的资金，用于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在“一种复合型蜂产品及其制造方法”研发成功尝到甜头后，再接再厉研发一种饲养蜜蜂的新方法，为公司技术创新、塑造品牌打了坚实基础，为大专院校的科技人才铺设了平台，实现了企校结合。目前，拥有 32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2 项发明专利。

我们的科技创新，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是通过委托开放、介入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合作关系，建设“没有围墙的研究院”；二是把公司自身的研发中心建成“加速器”，对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化，同时对市场产品进行改进，从而确保了公司在大健康领域产品研发上的高科技起点、高速度和低风险。

在科技创新体系上，实现从“蛋”到“鸡”的升级，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地的思路，把基地建设成三位一体的研发中心，即：建立生物技术和保健出口技术中心，建立生物工程师孵化基地，建立符合 GMP 标准的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蜂产品试验和生产基地。

在追求专业技术领先、产品服务优质、卓越绩效的同时，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企业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并努力建设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公司现有科研技术人员 16 人，博士 1 人，中高级职称 30 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32%。科研技术人员，主要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形成较强的科研开发能力。

大兴蜂业传承祖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已由作坊粗放型发展到初具规模集约型，由单一产品内销发展成直接出口外销，由注册资金 1000 元扩大到 2518 万元，由租借不足



大兴蜂业森林蜂蜜

200 平方米厂房到扩建占地 21600 平方米新厂房，由年产值 2 万元增加到近 1.2 亿元，由利税 2000 元增加到 1000 万元。在业界，大兴蜂业成为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蜂产品分会副理事长、中国蜂产品协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进出口商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养蜂学会副理事长单位，堪称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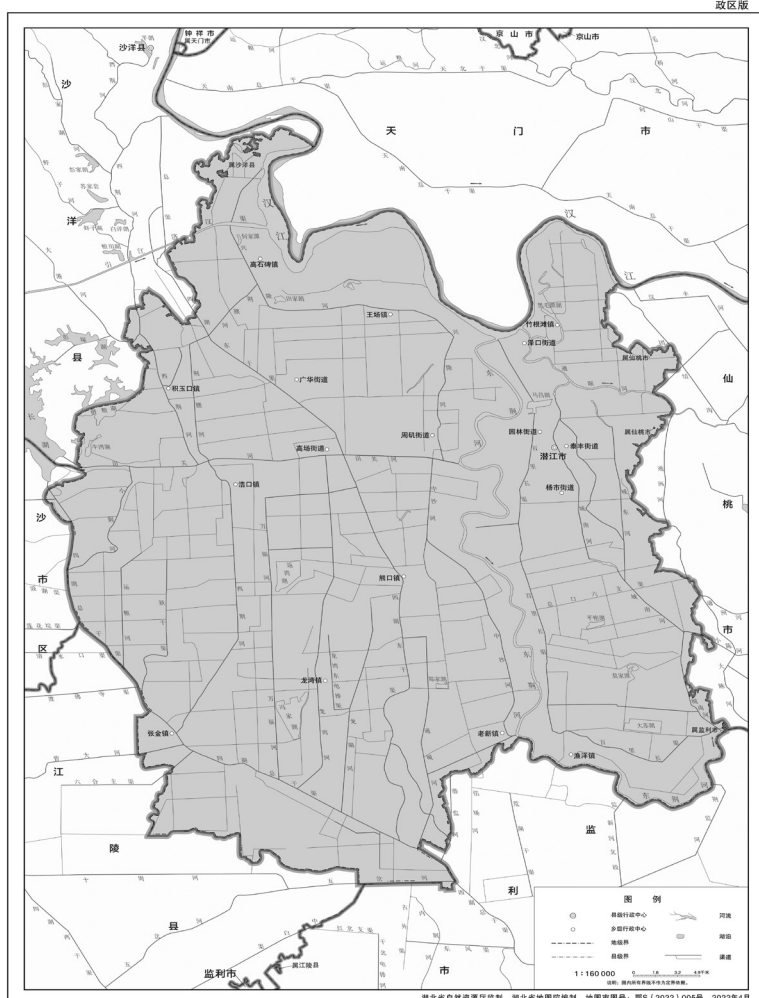
蜂业是甜蜜的事业、绿色的行业、环保的工业，我们将进一步关注、研究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一步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使大兴蜂业朝着规模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建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集团化产业公司。

黄朝阳，武汉大兴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潜江历史文化简介

◇ 余晓勤

潜江市地图



潜江是湖北省直管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全市国土面积 2004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99.6 万，辖 1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 个国有农场、10 个乡镇、7 个街道办事处，素有“曹禺故里、江汉油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美誉，获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民生改善十佳典范城市。

历史悠久底蕴丰富。潜江自宋乾德三年（965 年）建县，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境内发掘出的章华台遗址，被誉为“天下第一台”。公元前 540 年，楚灵王即位。为炫耀国力，威镇诸侯，“穷土木之技，殫珍

府之宝”，在古云梦泽修建了一座以章华台为主体、由 22 座宫殿组成的皇家宫苑。章华台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唐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咏史诗描写章华台古迹。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之一：“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竭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白居易在《杂兴三首》其一中写道：“云梦春仍猎，章华夜不归。”2013 年，章华台基址展示馆竣工并对外开放。

红色土地革命摇篮。在中国近代史上，潜江李氏兄弟蜚声华夏，李书城是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民国元勋、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潜江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县份，也是当时唯一全境皆苏区的县份。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红六军、红二军团曾在潜江设立军部，贺龙、廖汉生、许光达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浴血奋战，潜江还是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解放战争时期，潜江是大军南下的前进基地。作为革命老区，潜江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现在册存档的烈士就有 4200 多名，而未申报、未存档的烈士估计在 2 万人以上。无数的仁人志士，催生了光耀神州的红色文化。

群众文艺百花绽放。楚风流韵两千年，戏曲和诗歌的芬芳弥漫在潜江大地。潜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曹禺先生的故乡，为继承和弘扬曹禺先生的戏剧艺术和人文精神，先后建起了曹禺著作陈列馆、曹禺戏楼、曹禺陵和曹禺纪念馆，曹禺文化滋养着潜江人的灵魂。潜江人杜鸣心为著名诗人艾青《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谱写的歌曲，曾广为流传。1979 年至 1981 年间，潜江创作

歌曲《牛郎织女》《社员个个盼四化》《小妹劝歌》等作品获省级创作奖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花鼓戏《拦花轿》曾进京为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演出，《家庭公案》被全国 200 多个剧团移植。《秦香莲》和《站花墙》先后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助项目。进入 21 世纪，一个仅有百万人口的潜江，写诗的竟有 3000 多人，称之为“潜江诗群”。潜江在抒情诗、乡土诗、意象诗、口语诗、先锋诗等多种类别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意义的诗人。2007 年，潜江被授予“中华诗词之市”的称号。

“五七”文化谱写华章。1965 年 9 月 27 日，部署在潜江钟市构造钻探的钟 11 井喜获自喷油流，江汉油田现世。1966 年 8 月，石油部将江汉油田升格，代号为“五七厂”，后更名为“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1969 年，百余台钻机汇聚江汉，12 万石油铁军、转业军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师江汉，在江汉平原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石油大会战。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战，对开发“三线”、巩固国防，改善我国工业布局、加快石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旧址于 2015 年重新修缮，围绕指挥部、大会战、石油人三个主题共布展图片、文献资料、文物等 200 余件，将其作为石油精神、石化传统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2019 年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2022 年获批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余晓勤，潜江新闻网记者

闪耀华夏的潜江李氏两兄弟

◇ 别国庆

潜江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中既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的庚子烈士傅慈祥，又有日知会总干事“铁汉”刘静庵，还有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钱瑛等。而出生于现潜江市园林街道办事处袁桥社区的李书城、李汉俊两兄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李书城，辛亥革命元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汉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工人运动先驱，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李氏两兄弟一生追光逐梦，携手共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征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潜江初长 弟弟与哥哥志存高远

李氏两兄弟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清贫的耕读之家，李书城是次子，李汉俊排行第

三。他们的父亲李金山，号远蓝，字凤亭，早年发奋苦读想走仕途，可到38岁才中县里秀才。于是放弃入仕之求，在县城西堤边开设学堂，终身以教书为业。李金山虽然执教于穷乡僻壤，但通达时局，博古论今，为人正直，所教子弟中产生了多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巨子，如傅慈祥、刘静庵等。他们的母亲王氏，虽出身贫寒，但心地善良，宽厚仁慈。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她是一个家教甚严的人，在家不许大声喧哗，特别是吃饭不能有剩饭剩菜，哪怕是一颗米粒也不行，吃饭时候更不能发出声音。

李书城，出生于1882年6月24日，7岁时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16岁时赴县城考中秀才，因大人在他长辫子上扎一根红绒绳，故被乡亲们赞誉为“红绒绳辫子的小秀才”。1899年，李书城到经心书院学习。其间，李书城尤其喜欢日文，认为日文与汉文相近，学起来容易，并开始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异同，对政治产生浓厚的

兴趣。1900年,吴禄贞、傅慈祥、唐才常等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下游举行武装起义,傅慈祥、唐才常等20多人被清廷捕杀。次年,李书城与吴禄贞相识并成为挚友。李书城目睹清廷的残暴和腐败,立志要为死难者报仇。

李汉俊,出生于1890年4月28日,从小聪慧过人,学习勤奋,5岁起进入其父所办的私塾读书识字,接受启蒙

教育。李金山思想比较解放,没有让他久读于自己的私塾。6岁时,李汉俊被送进县城新式小学堂读书,后随胞兄李书城到武昌新式高等小学堂读书。在李书城等人的影响下,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从小就萌生远大理想。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日本求学 弟弟随哥哥探寻真理

1902年5月,李书城以湖北官费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与他同行的有黄兴等30人,同班上课的有浙籍学生鲁迅等。在日本,李书城深感“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翻清廷。”于是,他积极从事反清爱国运动,组织成立了“湖北同乡会”,创办了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1903年夏,李书城与黄兴等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触怒清廷被迫回到湖北。

1904年春,李书城得到朋友的资助再次东渡日本作为自费生留学,冒用“丁人俊”



李书城照



李汉俊肖像

之名先入振武学校,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5期。这次留学日本,李书城带上了小他8岁的弟弟李汉俊。本来两兄弟的父亲李金山是不太同意李汉俊随行的,一方面认为李汉俊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因李书城此次是自费生,家庭财力有限。吴禄贞知情后,见李汉俊聪明伶俐,很是喜爱,主动提供资助,并说服李金山。李金山认为,兄弟两人留学一个学文,一个学武,将来也好为国效力。甘鹏云著《潜江李府君墓表》中记载:“嗣复俾其幼子人杰(汉俊)东渡学习工商业,训之曰:富国强兵,皆国家所急,汝兄弟各成专才,以备国家用,吾之望也。”

在日本,李氏两兄弟以各自的方式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5年7月,孙中山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李书城相识,一见如故。8月20日,在东京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李书城化名“李唐”入盟。李书城自始至终参与同盟会筹备工作,深受孙中山的赞赏。同盟会成立不久,为保存革命力量,李书城按照黄兴的指示,在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中选择忠诚可靠的同盟会会员另外组织一个团体“丈夫团”,这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

先锋。1908年10月，李书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李汉俊到日本后，初入东京经纬学堂，次年4月10日，以“李定”之名入美法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晓星中学学习，后注册姓名改为“李人杰”。1906年暑假，李汉俊在日本友人家中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明他因羡慕革命，逃出学校，跟着哥哥跑到日本来的故事，孙中山笑逐颜开，问他的姓名年纪及为什么要革命。孙中山拍着李汉俊的肩膀说：“好小孩子儿，有志气，中国有希望了。”

1910年3月29日，李汉俊从晓星中学毕业。回国后，李汉俊经历了两件大事件，一是辛亥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武昌起义爆发后，其兄李书城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亲自指挥了汉口、汉阳之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李书城担任了陆军部顾问和总统军事秘书。二是1911年11月7日，曾资助他留学日本的恩人吴禄贞因准备在京畿发动武装起义而被暗杀。在耳闻目睹革命者的奋斗与牺牲，以及民国的新举措新气象后，李汉俊于1912年春夏之间在南京加入改组为政党的同盟会。

1912年9月12日，李汉俊获民国政府官费资助再次前往日本，入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学习，主修工程技术。李汉俊无论是在晓星中学，还是在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成绩都名列前三等。

1915年7月1日，李汉俊被东京帝国大学录取，就读土木工学科。随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经历“冰河期”后再次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汉俊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交往频繁，在比较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真理。李汉俊在《十四年前的回顾》

中说：“民国五六年，我在大学接触马克思底学说。”

上海建党 哥哥是弟弟坚强后盾

1918年冬，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从日本毕业回到上海，最初随李书城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1919年春，在渔阳里6号对面的湖北善后公会，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等相识，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新思潮，推荐进步书刊，引导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李氏两兄弟搬家到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与李汉俊家一起搬家的还有星期评论社。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是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那个编辑部很像个样子。”

1920年秋，由于家里人口减少，为节约房租，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两幢房屋，并把两幢房子打通变成两楼两底。从此，那里被人称为“李公馆”。

在哥哥李书城上海的家里，李汉俊开启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李汉俊草拟了党纲。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到广东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1920年秋，在李汉俊的亲自指导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董必武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

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

筹备和保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是李汉俊对中国革命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筹备会议期间，陈独秀在广州，李汉俊常就一些问题与李达、陈独秀通信讨论。为了掩护会议的召开，6月24日，李汉俊与李达、陈独秀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新时代丛书”编辑部缘起》，编辑部通讯地址就是李汉俊在上海的寓所。在确定了大会的日期、地点后，李汉俊和李达分头或联名写信通知各地早期组织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并给每位代表寄去了一百元路费。

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会议，并为马林作翻译。30日晚，第六次会议被密探打断，代表们安全撤离后，面对蜂拥而至的法国巡捕和密探，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沉着应对，巡捕搜查近两个小时后，一无所获离开。

包惠僧回忆：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余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



李书城任命书

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对李汉俊的革命活动，李书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据薛文淑回忆，看到李汉俊每天忙里忙外，常常见到朋友来找他，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李书城曾对她说：“汉俊的事，你们不要去管，他们所作的事是大事和正经事。”在经济方面，李书城对李汉俊更是鼎力相助。薛文淑回忆说，李汉俊有一次回湖北，临走时，交给她一张当票，说：“嫂子，等以后有钱了，请你把它赎出来，若没有钱就算了。”后来薛文淑用100多元钱去当铺将东西赎了回来，原来是李汉俊的前妻陈氏遗留下来的一些金银首饰，她把这些首饰还给了李汉俊。当时她纳闷不已：汉俊在外面是教书的，还经常发表文章，总该有点收入吧，而他从来没有给家里分文，连他的孩子们的生活费用都是由李书城给的。他的生活简朴，几乎一日三餐都在家里用膳，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当铺呢？后来她才知道，他的钱大都用于革命之需了。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并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江城风云 哥哥同弟弟并肩战斗

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李汉俊是幕后指挥者。李汉俊在林祥谦家里参加罢工动员会，并亲自带领学生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罢工期间，还与董必武、施洋等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招待辛亥革命元老、社会名流座谈，呼吁社会各界援助和支持工人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李汉俊因受到通缉赴北京避难，在李书城的帮助下，担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简任秘书，并用部分薪金为二七惨案善后捐款。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李氏两兄弟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武汉大肆清党，李书城在清党中拒不登记，从而退出国民党。8月1日，李书城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面对日益险恶的形势，李汉俊遵照董必武、李富春的指示，留任改组后的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著名民主人士邓初民回忆：在这紧要关头，我和李汉俊幸好得到李富春同志的指示，他说：“你们的摊子能守好久就守好久。”我就和李汉俊、孔庚等人继续留在“清党”和“整理”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李氏两兄弟利用合法身份，掩护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西征军到达武汉前夕，李书城等以省政府名义，将当时关押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两三百人全部释放。

1927年12月17日晚，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寓所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部以“湖北共产党首领”罪名逮捕。董必武和李书城闻此恶讯，立即分头设法营救。但胡宗铎不加审讯，下令枪决。当晚9时，李汉俊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场被杀害，时年37岁。18日，胡宗铎部又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李书城逮捕，软禁在卫戍司令部楼上。李汉俊遇害后，其尸体被曝晒数日，不准亲人收殓。李书城副官周惠年和傅慈祥之子傅光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运往武昌大东门的长春观内。1933年，武汉人民强烈要求安葬李汉俊，时任民政厅厅长的李书城也请省政府予以安葬，李汉俊的遗体才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李书城在追悼李汉俊时撰写了一幅挽联：枭鸟九头，死在泉壤难瞑目；荆楚三户，终是暴秦掘墓人。

1928年3月，李书城经多方营救获释。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李书城始终追求光明和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盟者。1949年10月1日，李书城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在政务院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李书城担任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周恩来说，李书城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

1952年8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李汉俊家属签发了第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上面写道：“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别国庆，中共潜江市委办公室干部

潜江虾稻正年轻

◇ 王秋高

一只虾，一个产业，红火了一座城，创造了“小龙虾、大产业”的传奇。

传奇的书写，得益于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持续不断的创新之举。功不可没的，是小龙虾养殖模式的实践创新。从“虾稻连作”到“虾稻共作”，乃至“虾鳊稻”“虾龟稻”……“虾+N”各种模式的创意搭配，让世代生活在潜江这块热土上的农民，插上了致富的翅膀。

一个外来生物，经过30多年的培育，现在成为集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一体的三栖“明星”；一只稻田“害虫”，仅仅在江汉平原的潜江市就衍生出六家产值过亿、数十家产值千万的企业，解决10多万人口就业。从种植、养殖，到加工、贸易，再到精深加工，层层赢利、环环增效。在土地细碎、成本高企、劳动力短缺、环境污染等不利因素的掣肘下，“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书写了一部厚厚的市场传奇。

低洼地成了“聚宝盆”

2007年7月21日，省政府第四届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会暨全省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主席台上，时任湖北省省长罗清泉为一位普通农民请功。他在会上满怀激情地大声说：“过去，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稻田里不能有龙虾，担心龙虾破坏水稻生长，可是潜江的一位普通农民却发明了‘虾稻共生’模式，带动了全省龙虾养殖产业的大发展。我建议，省科技厅要给予他奖励！”

省长口中赞不绝口的这位普通但不平凡的人，就是刘主权。刘主权何许人也？他是地地道道的潜江市积玉口镇宝湾村农民。

积玉口镇地处潜江市西北，因地势低洼、湖泊众多，人们戏称为“水袋子”，三分之一的低洼田每年只能种一季中稻，其他季节都被闲置、抛荒。30年前，农民种田

要交集体提留。但这些赔钱的“冷浸田”，农民即使白交提留也不种。镇领导下令，严禁农田抛荒。当时，刘主权任宝湾村党支部书记，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只得和村民褚洪云将农民抛弃的150亩低湖田承包下来。这一大片稻田，地势低洼，常常被淹，究竟怎么个种法，刘主权心里着实没底。

有一天，刘主权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望着大片被抛荒了的稻田，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脑海——就在这稻田里养虾。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原产于北美洲，20世纪30年代从日本移入我国。几十年来，小龙虾不断繁衍生息，种群迅速扩大。20世纪90年代，小龙虾在潜江农村盛传为外来“害虫”。这小龙虾夹断秧苗的根，尤其是喜欢在田埂里打洞，让稻田保不住水，很让人头疼。

收割后的田野在初秋的风中，空旷一片。对于农民来说，田可是个宝贝，人有时候可以闲着但田不能闲啊。刘主权想着，何不错开季节，先在这养虾子，然后再种水稻？就这样定了，说干就干。决定养虾之前，刘主权去了趟镇上的集市打听行情，每斤虾可卖8毛钱，他粗略一算，“赚头不多，但总比荒着田好”。2000年10月，刘主权买回来150公斤的野虾苗投到低湖里。隔年四月，他捞起了1500公斤小龙虾，卖了5000元。他以为龙虾和养鱼一样可以常年捕捞，可是到了5月底，半只龙虾也捞不起来。想来想去，才知道虾子怕热，温度一高就钻进泥里去避暑了。

龙虾避暑期间，恰好是低湖田种水稻的季节。刘主权琢磨，收水稻后，田里剩的稻梗就是天然的饲料，又赶上投虾苗的时间。到来年五月，刚捕完龙虾，刚好能接上种植水稻。按照生长周期，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2016年，刘主权应邀在安徽省蒙城县给当地农民作虾稻种养培训

2001年秋，刘主权又买来400公斤野虾投入稻田里，次年春季，他捕捞起1万公斤小龙虾，卖了4万多元。紧接着他又种水稻，卖了2万多元。就这样，刘主权在实践中琢磨出“虾稻连作”的种养模式——低洼田里的中稻收割后，投入小龙虾，利用稻田的天然饵料生长，次年春耕前捕捞小龙虾，接着再种植水稻。

刘主权养虾致富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宝湾村，“虾稻连作”的养殖方式迅速普及开来，一下子火了起来。昔日无人问津的低湖田，变成了抢手货，成了“聚宝盆”。2004年，宝湾村四五百亩低洼田全养上了小龙虾。到后来，发展到良田养虾。2005年，村里百分之八十的村民成了虾农。紧接着，稻田养虾，走出积玉口镇，在潜江市遍地开花。

虾肥稻香助农民增收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这一动一静,勾画出了湖北潜江市田野中最美、最灵动的画卷,而这也正是潜江小龙虾从“虾稻连作”向“虾稻共作”生态种养模式转变的生动写照。

潜江小龙虾产业之所以能迅猛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虾稻连作”种养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的“虾稻共作”模式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样受到农民欢迎。

创新没有终点,探索永不停止。这其中包含了省、市水产技术专家们的执着追求。

2010年4月前后,由于持续低温阴雨,许多小龙虾规格不达标,但是马上要插播水稻,虾农们不得已只能低价甩卖。这时候,“虾稻连作”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龙虾产量在低位徘徊,养虾种稻茬口紧张的矛盾凸显,不仅直接影响经济收入,还抑制了农民的种养热情。“虾”“稻”的茬口矛盾如何破解?

产业遇瓶颈,科技来攻关。省市水产专家们经过3年摸索创新,2013年,“虾稻连作”升级版“虾稻共作”模式横空出世。专家们一致认为,此项技术代表了当前我国稻田综合种养最高水平。

“虾稻共作”,即在技术操作上实现小龙虾与水稻的共作共生。在稻田中沿田埂挖出的环形虾沟,由原来1米宽、0.8米深的小沟,改成4米宽、1.5米深的大沟。每到插秧时节,把尚在幼苗期的小龙虾移至沟内生长。等秧苗长结实了,再把沟里的幼虾引回到稻田里。这样做,四五月份收一季虾,八九月份又收获一季虾,就是“一稻两虾”。

“虾稻共作”一亩田可多产100多公斤商品

虾,增加收入3000多元,是“虾稻连作”效益的2倍多,达到了虾、稻同步增产和品质同步提升的目的。

对此,有关领导和专家盛赞,“虾稻共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典型代表,是一次现代农业的革命。

湖北省原副省长任振鹤说,“虾稻共作”的综合种养方式,为全省确立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标杆,提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样板;“两高一优”的绿色发展模式,为全省创造了城乡统筹协调的新优势,构建了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典范。

稻田养虾,不仅让农民增加了一笔养虾的收入,而且因为小龙虾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再加上小龙虾生长对稻田水质的要求较高,虾农采用原生态的方式防病治虫,出产的稻米品质明显优于普通稻米。“虾乡稻”比普通稻收购价每斤高0.2元左右,虾乡生态稻米的市场售价每斤更是高达20余元。从此,“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在江汉平原流传开来,走向全省。

尽管稻田里开挖养殖沟会占用部分面积,但因为农民积极性的增加,水稻总面积却并未减少。据统计,近年来潜江稻田总面积年年创新高,2011年45.83万亩,2012年52.45万亩,2013年55.77万亩,2014年则达到了58.41万亩。2014年,潜江粮食总产53.27万吨,实现“十一连增”,首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虾稻共作”模式在宏观意义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政治意义凸显;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经济效益显著;农药化肥的少用甚至零使用,有利于种养品种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生态效益明显提高;实行规模化、专业

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和推动城镇化等农村改革热点难点问题做出了可喜探索，社会效益突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潜江考察时说，要大力推广“虾稻共作”生态种养模式，大力培育“虾稻”和“稻虾”两大品牌，把小龙虾产业进一步做强做大。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潜江调研时，高度赞扬“虾稻共作”生态种养模式为全国农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这场堪称农业革命的种养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循环农业、效益农业的生动实践，是稻田综合种养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典范。

“虾稻连作”开创了农业种养模式新天地，而“虾稻共作”更是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这一发明创造具有了普遍意义。

舌尖上崛起百亿产业

历年来，潜江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虾稻产业的发展。

为了给农民养虾提供载体，潜江市通过推动土地流转等方式，集中连片建设了一批基地，承包给农民进行生产，同时出台支持政策。在后湖张家窑虾稻共作基地，雷场村村民左绪林承包80亩稻田和水面养殖小龙虾，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他说，稻田养虾，每亩光小龙虾就可以收350斤，每斤10多元，再加上水稻收入，一年二三十万元的收入不成问题。



201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调研

顺势而为，金融保险机构纷纷推出了服务虾稻共作的新产品。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在全市推行“欣农贷—虾稻共作产品贷款”业务，帮助农民解决虾稻共作融资难的问题；中国人保财险公司采取政府补一点、农民出一点和人保财险贴一点的办法，在全省率先开展小龙虾养殖保险业务，力争解除农民发展虾稻共作的后顾之忧。

2015年10月28日，潜江市召开龙虾产业升级发展推进会议，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小龙虾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快潜江龙虾产业升级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龙虾产业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潜江将把龙虾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市的第一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示范产业、接二连三的第一综合产业，切实做大做强做远。

而今，潜江对虾稻产业的扶持正在加大力度：实施退田还湖，建设2万亩原良种保护地；建立小龙虾产业发展基金；成立小龙虾产业发展局……

目前，潜江市虾稻共作面积85万亩、

池塘精养虾5万亩，建成13个万亩和70个千亩集中连片虾稻共作标准化生态种养基地，荣获首批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称号。

2022年6月25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2021至2022年度“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为288.9亿元，品牌价值同比增长14.7%，连续四年荣登行业榜首，比排名全国第二的小龙虾区域品牌价值高出34%。

只有做强产业，才能拉长链条。车流不息，车间忙碌，活虾来，美食出，这是每个小龙虾加工厂在虾季的真实写照。

目前，潜江市有小龙虾加工企业33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家，年加工能力达35万吨。2021年，全市完成小龙虾加工原料虾33万吨，加工产值210亿元，销售额205亿元。

聚合力、强效益，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是潜江市在推动虾—稻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上的重要一步棋。

然而，好棋不止一招。近年来，潜江市积极与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小龙虾加工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加快突破加工设备、精深加工、风味食品、快消食品等关键技术难关，创新研发小龙虾餐饮熟食菜品、即食产品、调味料等，探索小龙虾低聚糖（壳寡糖）在保健食品、化妆品、医药品等领域突破性发展，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对照柳州螺蛳粉从地方小吃转变为百亿网红美食神话案例，潜江市探究“潜江龙虾”快消食品的发展方向，推出蔬菜虾仁盖浇饭、虾球快餐面等低价格高产能龙虾快消食品。创新虾稻、虾茶等捆绑营销思路，延

续“虾茶恋”系列产品研发势头，开发“潜江龙虾”与田螺、鱼、蔬菜等捆绑营销产品，带动其他食品价值，真正让小龙虾实现从“论吨卖”向“论顿卖”。

产业发展既要“农”墨重彩，更要“融”出精彩。“潜江龙虾”的火火在了舌尖，好滋味吸引了一波又一波食客来潜品龙虾、游水乡。如今，潜江市已建成集度假旅游、龙虾美食、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生态龙虾城，创新推出油焖大虾、蒜蓉虾、清蒸虾、卤虾等128道小龙虾菜品，其中中国名菜4道、湖北名菜10道，在全国开设虾皇、味道工厂、小二上虾等“潜江龙虾”餐饮名店3000余家。

潜江市还将启动“潜江龙虾”旅游纪念品超市和电商中心建设，打造多元文化元素的特色主题商业馆，让参展人员沉浸式体验小龙虾文化与城市特色。同时，依托龙展馆二楼2000平方米电商中心，计划培养3000名网红主播，助推网红经济发展……

节会搭台，商贸唱戏。连续多届湖北（潜江）龙虾节，既让潜江的开放度和荣誉度不断提升，更让潜江奋力打造千亿虾稻产业集群的目标愈发坚定。

一虾一稻点亮了这座城市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成为潜江最靓丽的城市名片。坐拥天时、地利，灌注勤劳，融入智慧，潜江对虾—稻产业发展志高而意远，这一场红色“风暴”势不可挡！

王秋高，《潜江日报》原记者、潜江市渔洋镇小学教师

清末民初积玉桥

◇ 孙庆力

老照片惊现百年前图景

积玉桥，在武昌是个颇有名气的地方，源自武胜门外护城壕上的一座桥。据说“积玉”二字，是“鲫鱼”的发音演变而来。

武胜门是武昌城唯一的北门，积玉桥这一带地势低洼，东边紧邻沙湖，西边挨着长江，早期每年夏季时节，除了一条武胜门通往青山镇的路埂和一些土墩高地外，长江

和沙湖几乎要连在一起，全被洪水侵占。

清末张之洞督鄂，兴工修建一条从武昌城到青山镇的长江堤防——武青堤，并在青山镇设武丰闸，将长江和沙湖水系隔开。之后，积玉桥一带告别了洪水的浸漫，渐渐形成现代工厂和商户云集的区域。

从一个网站链接中，笔者发现一张从未见过的老照片，标有 Wuchang（武昌）外文单词，惊讶地看到它再现了积玉桥 110 年前的景象。



初看这张照片，远处水域应该是长江，更远处的正中似乎是汉口水塔，加上原照有“Wuchang”的提示，毫无疑问这地方的确是在武昌。然而它是武昌哪里呢？

根据照片呈现的画面和视角，拍摄地应该是在山上。武昌靠近长江的地方有蛇山，还有城北武胜门两边的凤凰山和城山（也称螃蟹岬），具体的位置笔者试作下图予以还原。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绘制时为了使视角与老照片一致，已将原地图顺时针偏转了约30度。图中的扇形区域，即为老照片所摄录的范围，其中有几组特别用字母作的标注，供读者识别时参考。

粤汉铁路路基尚未修建

结合示意图再看照片，照片中景里有一块空地，其间似有几条空旷的道路，与地图中所标注的一马路至四马路正好一一对应（B点），这里不久后兴建了著名的武昌第一纱厂。

显然，这是武青堤建成后获得的地皮红利。空地左边有一白色围墙院落，院内临江一栋有着类似殿堂般的屋顶很是突出，在地图上此处标示为彭杨公祠（A点）。

值得关注的是，示意图中彭杨公祠院内有形制大小相同、并列坐落的两组建筑，显得非常独特，据说是纪念湘军水师统领彭刚直（玉麟）和杨勇恣（岳斌）二公的祠堂。近处有堤埂从一片水域中穿过，指向江边。放大照片查看，可见堤埂上有模糊的铁轨和枕木，这当是武昌

城内铜币局的转运小铁路（C点）。

此铁路从宾阳门出城，顺城墙护城河外绕行，至江边的铜币局专用码头。这条铁路的路基，即是今天从江边大堤口至大东门的中山路前身。铁路路基的内侧是城墙外的东城壕，外侧则是沙湖。湖中有几条小船，据此可推测横跨沙湖的粤汉铁路的这段路基还未修建，此地还未被封闭而成内沙湖。

草埠门外有沙湖码头

湖边岸上是武胜门外正街（也称积玉桥街）两边密集的房屋，其中一些房屋前门临街，后院临湖。图示武胜门的瓮城门，就



以《1908年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为底图绘制对比老照片



2019年作者在瓮城东北角，右为瓮城内

在照片左边画面外一点点，遗憾的是为什么摄影师不将镜头向左偏转一下，将瓮城也摄入镜头呢？不过对于这样高位拍摄的大视角照片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照片的拍摄地，大约在今昙华林三义殿街石英故居背后的山上。当时的武昌城墙从武胜门过来，经过这里一路向东在城山（螃蟹岬）向上爬行。如在此地城墙向北眺望，城外山下的沙湖烟波浩渺，湖水直抵城墙边。

历史上的沙湖之大，远非今天的人们所想象，它的湖港、湖岔甚至延伸到了洪山脚下。明代文人杨士奇，在武昌任官期间与友人出游，在洪山边的茶港一带游玩。夕阳西下时返回，他在《游东山记》中写道：

“……时恐晚不能入城，度涧折北而西，取捷径，望草埠门以归。”他没有详说怎样“取捷径”，但他们舍弃来时的宾阳门外大街不走，抄洪山北麓的小道过忠孝门（明代称小东门）不入，却从武胜门（明代称草埠门）入城，笔者推测应当是途中转乘小船到武胜门进城的，因武胜门外东向被沙湖阻隔没有道路。若是走陆路进城，当然应该是忠孝门，但他们舍近求远，合理的解释这个“捷径”就只能是乘船了。

历史上武胜门之所以称草埠门，从名字上来理解这里是有码头的。2018年底，

正在兴建的地铁5号线在此进行基础施工，武昌区组织考古队对武胜门瓮城遗址进行勘探清理工作，使掩埋地下的巨大遗址展露于世。其间，世居于得胜桥四街巷的笔者常常来此探察。在武胜门瓮城墙东北角城外墙角处，发现整齐平铺的红砂石踏石出土，上面有常年磨损及疑似车辙的痕迹，为曾经的码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董必武在彭杨公祠开办学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老照片中的彭杨公祠，有关它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据《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一文，1922年董必武曾经在彭杨公祠内开办武汉中学第二部，吸引旁边武昌第一纱厂的工人来识字班学习，借此开展早期的工人运动。

笔者查阅到的历史地图资料显示，1920年代末期，彭杨公祠里先后开办过省立第八小学和楚才中学，直到1949年的地图上彭杨公祠还存在。

本文所展示的这张老照片，来自瑞典宣教圣约教堂档案库，没有查到拍摄者的姓名，估计是当时在昙华林的瑞典行道会人员所拍摄。汉口水塔于1909年建成，而武昌第一纱厂在1915年才开始集资筹办，所以，这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处于两者之间应该是很明确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的时间并不长，但从我作的1966年积玉桥同区域的实景图对比，其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孙庆力，华中航运集团公司工程师，
致力于武汉老照片的收藏与研究

我家曾在宗关住

◇ 郭 迅

汉口的硚口往上五里，汉水河堤上曾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街市——宗关。它长七八百米，上自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胜新面粉厂，下至福新面粉厂、申福新电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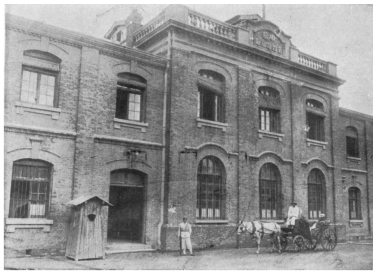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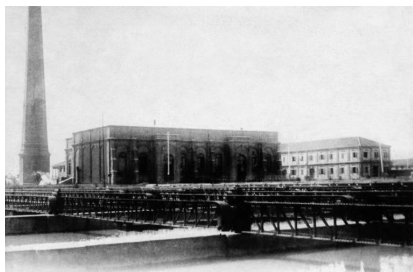
1930年代，我的父母在宗关成家立业，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说来已是百年。1954年大洪水威胁市区，政府紧急动员拆除河堤两边房屋，宗关街市从此消失。

1954年和1978年，宗关两头分别建成汉水铁桥、江汉二桥（知音桥），沿河大道一穿而过。如今，这里高楼大厦林立，

滨水小区幽静，但往日的历史烟火气息不可忘怀。

商铺扎堆成街市

追溯宗关的历史，与500多年前的汉水改道直接相关。由于这里是汉水连通长江的必经之地，清代专设海关对过往船只收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汉阳县志》中，一张“汉镇全图”标有“宗关”地名，同时绘有关署的房屋和旗帜，表明宗关距今



1920年代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申新第四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

至少有 200 多年。解放后，人民政府建立了宗关办事处，可见宗关的历史影响。

宗关的形成与繁荣，起于 20 世纪初英国教会迁来博学书院（今武汉四中）和太平洋天主堂，随后一批企业家、商人陆续在周边办工厂、开商店。

当年，宗关有英美烟厂、宗关水厂、申新纱厂、泰安纱厂，还有胜新、福新两个面粉厂和一家德厚砖厂。最早是 1908 年的英美烟厂，其次是 1909 年的既济水厂，它们留下了烟厂巷、水厂一路、水厂二路等地名。1918 年和 1919 年，荣氏家族的“福五申四”来这里安家，解放后成为武汉第一面粉厂和第三棉纺织厂，在轻工业系统赫赫有名。1932 年的军用汽车修理厂，即后来的武汉汽车配件厂，还造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军用吉普车。英美烟厂 1950 年代合并到南洋烟厂后，原址上建起了武汉抗菌素厂。宗关水厂至今仍在供水，办公楼、净水池等工业遗产保持完好。

宗关不远是张公堤，堤上走马行车交通方便，天门、汉川上游一带的粮食、棉花等上岸交易集散，沿堤催生了六个码头，货物装卸日夜不歇。

正因为码头、航运、工厂和居民的消费



1930 年代汉口的挑水工

需要，宗关既有方便交易的行栈，更有服务生活的商铺，聚为小集镇。据民国时期地方志记载：有米店三家、猪肉店七家、牛肉店一家、鱼行三家，有杂货店十家、煤炭铺六家，有中药店五家、西药店一家，还有当铺一家、茶楼六七家。其中崔洪兴鱼行，是我父亲在泰安纱厂迁重庆失业后打工的地方。

买地筑屋郭家巷

我 1942 年出生。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家在宗关郭家巷买了一块地，盖起一栋房，从小记得沿堤有肖家巷、宗关小巷、警署街等居民区。解放前，这里少不了保甲长称霸一方，三教九流横行无忌，鸡杂鸭杂（各类稽查人员）敲诈勒索。解放初，我亲眼见到保长等恶人被人民政府枪毙的情景。

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在茶楼选举居民组长。我父亲为人本分老实，作为三名候选人之一，每人身后放着一个碗，居民按规定用蚕豆丢到碗里“投票”，结果他被选上了，义务为居民服务。

警署街有一个救火队，救火龙（消防车）停在外边。解放后，政府在救火队的位置设立宗关街办事处。解放大道开通后，办事处搬到解放大道旁，与开办在太平洋天主堂的武汉第十医院相邻。一旁胜新面粉厂的宿舍前，建起了宗关街派出所。

警署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寺庙，解放初期时常在寺庙给穷人发救济，我曾端碗随街坊邻居排队领米饭。

郭家巷紧靠宗关河堤。巷口左边是吴记杂货店，店主的儿子吴正湘是我小学同学。巷口右边是济群堂中药房，老板俞济群，他儿子俞启瑞也是

我小学同学。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特别是夏天，常到张公堤外捉蚰蚰，捉到蚰蚰又到处找桑叶喂蚰蚰。

俞济群是硚口地区有名的中医，在济群堂专设一室接诊拿脉，一生名如其人，以医术“济群”，不仅宗关周边，连外地包括河对岸汉阳乡下的老百姓都来求医治病。

俞济群夫妇有8个子女，由于家教严格，个个成材。他们的大女儿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我的老伴就是经她介绍而相识的。至今，我们仍然时常念及她对我们的关心。

宗关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少有扯皮争吵。每年端午节河里有划龙船比赛，过年街上有划彩莲船、玩龙灯，更少不了玩武卖艺的。解放后，申新纱厂外的场地上，还经常放露天电影，我们小伢最欢喜看。不久建了硚口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棋牌室、篮球场都不缺，彻底解决了这一带无群众娱乐场所的问题。

水火无情留念想

宗关实际上就是一段河堤，堤两边盖有各种板壁房，多为两层，上层面堤开店，下层挨堤住家。每逢汛期，河水经常漫到下层屋内。

1954年，特大洪水来势汹汹，眼看要漫过宗关危及人民生命财产，防洪大军加筑一道小堤挡水。但情势越来越严峻，政府紧急动员，很快拆除堤上房屋，全部迁移到解放大道新合村安家。

堤上的商家铺子都走了，堤下的郭家巷、肖家巷、宗关小巷等也越来越萧条。



1954年，防汛大军在宗关附近的皮子街一带加宽沿河堤防

谁知祸不单行，1957年10月15日那天，靠近宗关小巷的武汉汽车配件厂车间的炉火星飘出墙外，引燃墙边居民的房顶草棚，很快波及一批板壁房。一场大火，几乎将肖家巷、宗关小巷烧光。好在我家是楼房，消防队又及时赶到，利用对门朱家的一层砖瓦房，集中力量射出水柱挡住火势，才阻止了大火蔓延。我当时正在武汉四中操场跟同学踢球，有人告知：宗关发大火了，还不快点回家？吓得我背起书包往家跑，看见家人抢了些衣被放到河堤上，母亲的额头还被房顶掉下来的碎瓦片擦伤。

我长大成人参加工作，由于父亲三次中风后病逝，我把母亲接到我住的江岸四唯小路邮局宿舍居住，慢慢断了与宗关的联系。

半个世纪过去，我已是八旬老人了，可心中不时回荡小小的念想：我家曾在宗关住……

郭迅，武汉市邮政局退休职工，曾任中国收藏家协会邮品专业委员会会长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区政协近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点燃广大委员读书热情，掀起“书香政协”建设热潮。本刊将陆续刊登委员读书的体会感悟，打造思想交流平台，促进履职实践，书香献礼新征程。

半生书香牵系“三世”政协情缘

◇ 卢 纲

人物名片：卢纲，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昌区政协常委，湖北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湖北省文史研究会、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书香门第 必须努力

我出身于一个读书家庭。奶奶祖上是嘉庆帝师、一品当朝、四库全书总撰、乾嘉学派鼻祖、清中一代大儒朱珪。她的祖父朱祖圻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安徽地区领导人、闻名江南的一代书法名家。我祖父卢立群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园林园艺两个专业，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功的著名爱国人

士，现在政府为他修建的名人旧居在黄鹤楼公园面向海内外开放。

我小学四年级前，处于“文革”后期，学工学农、批林批孔，学习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勉强考上了一所市重点中学快班，初中理科成绩先高后低，高中改学文科，竞赛拿了几次名次。高考好歹考上一所一本大学，但自己总觉得与理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业余时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看了几十遍都翻烂了，世界名著看了几十本，作文一直写得还可以。

大学毕业，先到省直单位当秘书，办杂志；后到湖北电视台当记者，搞新闻；当过部门主任，干过运营总监，得过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奖项，直到被评为首届“中

国广播电视网络领军人才”，才觉得聊以自慰。

我业余时间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喜欢看点历史、读点传记。为了看上去有点学问，读书暗暗下了几次苦功：四书五经，看不下来，就死记硬背原文，再逐句反复消化；《二十四史》，读得辛苦，就先看历代演义入门，先野史再回归正史；一部400多页的《简明欧洲哲学史》从头到尾至少背了三遍，顺势把欧美各个哲学流派的书找来生吞活剥；花了两年多时间把我喜欢的唐诗宋词，改成了800多首流行歌词；加上200本《全国政协文史汇编》、200本《台湾湖北文献》，看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漂学半生，大概就这点底子。

我认为读书还是要从源头读起，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网络时代这种浅阅读获取信息可以，但不解渴，要想真正研究学问，还是得深阅读。这些年读书的副产品是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500多篇文章、出了5本书。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湖北日报《大武汉》都开有多年的连载专栏，在华科大、中南财大等知名高校兼职客座教授，被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聘为统战智库专家。这就是我业余读书、写作几十年的大致经历。

政协读书 从我做起

2011年，我被推荐为武昌区政协委员，后增补为常委。2012年，被推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是十一届、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委员，十三届、十四届武昌区政协常委，现为十五届武昌区政协常委。人说的一届政协委员、一世政协情缘的话，那我现在起码有三世政协情缘，与政协的缘分着实不浅。而这段缘分，与萦绕半生的书香是分不开的。



2020年为配合疫情防控，在《湖北之声》发起“春节在家读好书”活动

谈到我与委员读书活动的关系，得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说起。当时正值春节，多年来，我早已把读书作为一种过节方式。除了积极向中央、省市建言外，为配合武汉这一时期的防疫政策，我发了条朋友圈：“如果拖家带口拜年团聚，新朋老友觥筹交集，同事同学搓麻蹦迪，飞机高铁自驾出离……这些都成了武汉人的不宜！那么就请选择在家读书面壁，在这个春节假期，你将收获久违了的读书的甜蜜，来年的你，将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却不曾想被《湖北之声》读书栏目的主持人炜炜看到了，应她的邀请，我们一道发起了“春节在家读好书”活动。当时，我为这一系列访谈节目写了几句活动宗旨：为政府分忧、为医生减负、为社会减压、为自己加油！

2020年1月25日，在第一期节目中我引用了一首诗，是2006年我出版诗集《如草吟风》中的《让生命在阅读中延伸》：

“让生命在阅读中延伸，

阅读可以让你穿越历史的迷阵，再见沧桑的浮沉；

阅读可以让你走出年龄的围城，去看未来的星晨；

阅读可以让你开启脑海的阀门，任凭思潮的涌奔；

阅读可以让你领略大师的谬论，倾听超凡的心声；

阅读可以让你增加广博的见闻，丰富谈吐的资本；

阅读可以让你浸蕴宁静的气氛，孕育气质的提升。

阅读可以让你解析人性的矛盾，照亮生命的行程；

阅读可以让你采集天下的养分，亮出精神的甘醇；

阅读可以让你忘却生活的郁闷，温暖无助的灵魂；

阅读，可以让你暂别俗务的缠身，做个云游的仙人。

阅读吧，朋友，它会让你有限的人生无限延伸。”

节目中，我谈到读书至少有三点好处：一、读书明理；二、读书赋能；三、读书养心。面对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的世界、发展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人们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得有自己的调节办法。我的调节办法就是读书：读一本好书，它可以让我在高兴的时候更加快乐；读一本好书，它可以让我在烦恼的时候忘却烦恼。所以我有了一个情绪的减压阀，有了一个精神的庇护所，有了一个灵魂休息的港湾。任何时候，我多了一道精神的保险并乐在其中，使我面对沮丧和困境，从来不会放弃自己、迷失自我！终生立于不败之地，不是真的不败，只是永不言败。

“春节在家读好书”名人访谈系列节目于正月十五以后改为“在家读好书”，与武汉隔离防疫同步，共做了76期。后作为定制节目进入武汉各大方舱医院，并被学习强国平台转发。该系列节目全国线上累计有40多万听众，抚慰人心、鼓舞斗志，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予以报道。当年4月份，人民政协报就此对我做了一期专访。4月23日，全国政协读书活动也正式开展起来。

2020年7月，湖北省政协颁发委员读书活动实施方案，成立读书活动指导组和指导组办公室，组建了委员微信读书群。我应邀成为省政协读书活动指导组成员和委员读书群的群主，倡议委员们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在读书中增长智慧、陶冶情操、涵养正气。

学以致用 不辱使命

政协委员主要通过政协提案和协商发言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最重要、最经常、最有效的方式。多年来，我发挥自己通过读书、工作积累的新闻传播、文学创作、文史研究等特长和优势，投入到政协履职当中。2012年以来，我每年提出2~4个政协提案，其中每年都有一个主打提案，涉及建立武汉抗战纪念馆、武昌旧城改造、打造大东湖景区、力推大武汉周末游等文旅领域重点、热点话题。

2013年，我提的《在省图旧馆建立武汉抗战纪念馆的建议》提案，是我在湖北省政协、武昌区政协履职的首个提案。为了把该案办成“铁案”，我先后查阅了数以百万



2022年7月，在省外文书店接受湖北经视采访时，谈委员读书与履职的关系

计的武汉抗战史料，走访了多位权威专家和知情人士。调研了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上海松沪抗战纪念馆、黑龙江江桥抗战纪念馆、云南腾冲抗战纪念馆、四川建川抗战纪念馆，甚至去台北参访，也不忘到“国史馆”查阅相关资料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案提出后，得到凤凰卫视、《新民晚报》等数十家媒体广泛报道，在海峡两岸和华人圈中都产生较大影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武汉抗战纪念馆至今尚未建成。但对武汉抗战史的深入研究，使我能继续向海内外讲述武汉抗战的故事，进一步梳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根脉。

我认为写提案，实际上就是写调研报告和策划案、建议书，没有读书、写作的基础，是写不出高质量提案的。读书能使你更容易看清事物矛盾的本质，能使你更方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前面说的读书明理、读书赋能的意思。

2021年10月10日，我在湖北省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110年前

的那一枪，射落了千年的皇冠；110年前的那一火，照亮了历史的至暗；110年前的那一炸，惊醒了沉睡的中国；110年前的那一炮，让世界记住了铁血的武汉……”非读书不足以挥毫泼墨抒意气，笔走龙蛇写春秋。读书能培养人的浩然之气，赋予人历史责任感和担当胸怀，这就是读书明心的内涵所在。

多年来，我的政协提案获省、市领导批示达20多次。为推进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做出了一点应有的贡献。政协委员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这句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我深知自己学的还不够、做得还不行，我还会继续努力，不光把履职写在纸上，争取更多地把它写在中国湖北武汉的大地上，新时代，读好书、履好职，继续努力干出政协委员的新样子、新风采！

让书籍成为委员进步的阶梯

◇ 万松

人物名片：万松，市政协第十三、十四届委员，武汉慧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出身于教师家庭，耳濡目染下，我从小就喜爱读书。2020年初，我获得市政协授予成立首个委员工作室的殊荣，地址设在中南路的外文书店五楼。当时市政协贴心地送来了不少图书，有《中国共产党简史》《武汉政协70年大事记》《优秀参政议政文集》《大师们的家风》等各类图书上百册。走进委员工作室，书香绕梁，学风浓厚。我的履职活动与读书是密不可分的，有三句古诗或可一表心迹。

—

第一句诗是明代爱国诗人于谦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是政协委员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待书籍就像是对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一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政协委员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提出高水平的提案和建议，靠的是什么呢？我理解的是，学习力是政协委员适应时代要求的重要能力，不断读书才能提升学习力，这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底层能力素质。读书可以提高政协委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敏锐性和逻辑性；读书可以提高撰写提案的水平，使之言之有理、切中时弊；读书可以全面提升委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全面提升个人能力和思想境界。

十几年前我是一名区政协委员，2007年12月武汉市获批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新能源行业的从业者，我在阅读学习中发现了国外发达国家和沿海先进城市正在推广一种叫作合同能源管理（EMC）的新模式，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投资，以市场化的手段即可实现节能降耗，推动绿色发展。在我国却鲜有人知，甚至不少政府主管单位领导也没有听说过。

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新模式是不是也能在武汉市推广呢？但本人不是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于是我去图书馆查资料，在网上检索所有能找到的信息，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我带着问题找到用能单位和相关部门，深入调研，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教，不断完善我的想法。最终，向市政府提出了在武汉市推广合同能源管理（EMC）的建议。

此提案参加了2008年的武汉统一战线“两型社会”论坛和征文活动，不仅获得当年征文的一等奖，还有幸得到当时武汉市领导杨松书记的重视和批示。如今这个模式在工业、市政、建筑、环保等领域大力推广，产生了实际作用和社会价值。

二

第二句诗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读书能建构和更新委员的知识体系。

世界形势瞬息万变，政协委员每年的参政议政方向和课题也在发生变化，这对个人素质、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名合格委员的“源头活水”哪里来？书籍就是我们的思想源泉。政治之书涵养品性，哲学之书推动思辨，专业之书滋养才干，兴趣之书陶冶情操。读书不嫌多，书目不怕杂，要能博采众长。

每一名委员都具有界别代表性，我们应发挥自身特长优势，既立足于界别又能够跨界，既能够各抒己见又注重思想统一，既能思想碰撞又能做到理性表达，在广泛阅读



2020年，为调研新能源物流车课题，万松（中）邀请相关单位代表在委员工作室直播交流

中进一步锤炼道德操守、提高思想认识，凝聚共识，有效提高建言资政的精准性、解决难题的有效性、操作方法的可行性，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我所在的东西湖区正努力打造“中国网谷”，奋进新征程，推动建设数字武汉。近期我正在读《走近新安全：读懂网络安全威胁、技术与新思想》《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等书，准备下一步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重点布局、招商引资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广泛涉猎的同时，要重视读经典、读原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一生能读的书数量只是沧海一粟，而那些经过时间积淀下来的书籍，是文化的源头，是饱含哲理的智慧源头，可让我们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可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榜样、指明方向。

作为政协委员的这几年，尤其让我思想和信念不断得到提升的是时政典籍和历史类书籍，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简史》《苦难辉煌》《奋斗与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问答中国：只要路走对，谁怕行程远？》等等。阅

读这些红色经典图书，使我在党史、新中国发展史的学习中以史修心、以史养志，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三

第三句诗是宋代诗人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书和实践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们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学思践悟。读书是“开天眼”，而调研是“致良知”，二者需能合一。我们常说“无调研，不提案”，“大课题，小切口”，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发现问题不难，但提出一条好的建议是不容易的，非得下真功夫不可。

我的委员工作室成立两年多以来，每年围绕一个调研课题开展工作。2020年的课题是“让新能源物流车成为武汉城市配送的主力军”。我们在前期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在政策执行、市场推动、金融扶持、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不足，武汉与成都、长沙等城市相比，无论是新能源物流车的数量，还是在城市配送中的地位、路权等各项指标，都远远落后，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2020年6月，我陆续邀请相关领域政协委员或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来到工作室面对面谈话。每次邀请两三人参加，选取一至两个话题，热烈讨论、畅所欲言一个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每次访谈都会进行直播互动，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增加网络议政的影响力。这一个月的委员工作室访谈活动，反响积极，更是为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例如，我们讨论到进一步放宽纯电动物流车的路权通行政策，引导燃油货车逐步

替换为新能源物流车，加快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绿色物流园区示范试点，持续开展客改货等违法行为整治，落实新能源物流车运营补贴奖励，鼓励新能源冷藏车推广应用等。

7月，我向市政协提交了一份社情民意，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完善，在2021年1月召开的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作为提案提交。此举引起了《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随后也得到承办单位武汉市公安交管局的积极回应。

2022年5月，在市政府新出台的政策文件中，新能源物流车的路权有效扩大，在许多区域不限行，得到了营运企业的交口称赞。如今在武汉的街头，随处可见行驶安静、不排放黑烟废气的新能源货车，它们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阅读大量的政策文件，没有认真细致地研究，没有与从业者和主管单位的深入沟通，我就不具备提出这个提案的能力。

读书可以培养我们的眼光，提高认知水平，增强思辨能力。而亲往实地调查研究，得到第一手数据，到群众中去面对面，把书本知识和实际融会贯通，才是政协委员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做到以学促研、学以致用，持续性学习，在学中干，干中学，悟道方能得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出高水平。让我们为建设“书香政协”、发挥好政协委员作用而努力读书！

从哈尔滨南下到武汉

◇ 佟 心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我入党已 76 年、南下到武汉已 73 年。从 15 岁少年到 91 岁老翁，跟着党一步步朝前走，靠的是什么支撑呢？回想革命生涯，深深体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15 岁入党寓意“同心”改名

我是满族人，1931 年在北国名城哈尔滨出生，家境贫苦，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人。1946 年冬天在哈尔滨一中读书时，我秘密加入了党组织，那年才 15 岁。

我原名佟春田，因为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5 个党员商量改了名字，连接起来就是“同心发动群众”，我用谐音改名叫佟心（同心）。

那时哈尔滨虽已解放，但仍然处于战争环境，社会上又存在敌特活动，情势是相当复杂的。我们的党员身份不能公开，党组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即使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大多利用饭后散步聊天，几个人边走边谈而进行。尽管没有公开党员身份，但由于我们在各方面表现较好，周围的群众还

是大致能感觉到的。1948 年 7 月，哈尔滨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才正式公开所有党员的身份。在此之前，我的父母和家人，都不知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6 年寒假，学校组织我和一些学生，到城郊香坊大嘎哈参加土改。我是工作队年龄最小的队员，其实最年长的也不过 18 岁，因此领导特别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显得成熟一点，毕竟我们属于稚气未脱的少年。

通过土改实践，我们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党性得到了锻炼提高。1947 年春，我分配到哈尔滨税务局工作。



1949 年南下到
武汉留影



2021 年参加建党
百年庆祝活动

参加干部教导大队南下

1949年初，为了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党中央决定从东北抽调一批青年干部南下，主要解决新解放的城市接管问题。

哈尔滨市委决定组成“南下干部教导大队”，我在第一时间报名。这支教导大队800余人，是支援关内新解放区的最大一支队伍，选调的条件很严。1月15日，经过严格挑选和政治审查，我们被录取的人员正式入伍，穿上了四个兜的黄军装。

1月15日开始，我们在南岗果戈里大街42号集训，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专门来作动员讲话。3个多月里，我们重点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及一系列城市管理方针政策。首先要求端正“入关”动机，南下一往无前不退缩，动员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宁愿南走一千（里），不可北走一砖。”

4月28日上午，我们一批热血青年乘火车离开故乡，随“四野”大军一路向南。我们没有想到，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市委常委宋一平也在同一列车上，他们后来分别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书记处书记。

在天津学习毛主席“两个务必”

4月30日到天津，大家分散安营扎寨，我们一大队三分队分配到一家没营业的西药房，男女挤住营业厅，中间挂个布帘子。

一觉醒来，是天津解放后首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大队部考虑为这个新生大城市营造节日气氛，让我们上街扭秧歌，参与庆祝游行活动。一点排练时间都没有，但对东

北老区来的我们不是难事，找老乡借来色彩鲜艳的衣服和红绸子，当天走街串巷表演，受到热烈欢迎，扭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隔几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又上街扭一次，情绪高亢。

这期间，我们集中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特别是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重要精神，进一步武装思想提高觉悟。

正在天津调研的刘少奇同志，给所有汇集于此的南下干部作了一场报告。他头戴鸭舌帽、身着灰布中山装，在台上侃侃而谈，讲了全国形势和党接管城市的政策，重点是正确处理城市的各种复杂关系，以确保市民就业和社会稳定。

接着，天津市军管会财经接管部部长宋乃德也给我们作报告，主要讲接管地市工作的注意事项。宋乃德是我在哈尔滨税务系统工作时的老领导，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税务总局局长，他提出克服游击作风等问题，非常有针对性。此后，他从湖南进京就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1958年，他



1978年，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视察湖北，作为原哈尔滨市委书记，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佟心（右一）等哈尔滨南下老同志

到河南调研时，总结推广了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办工业的经验，受到毛主席赞扬。

听报告前后，组织上安排我们观看京剧《闯王进京》，用生动的剧情，警示我们不要居功自傲、防止腐败变质。同时，组织参观天津市容，并去了劝业场和南开大学。我们强烈感受到，天津虽然刚刚回到人民手中，但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对接管新城市更有信心。

在天津休整十多天，我们到底南下接管哪个城市传闻很多，有的说上海，有的说南京，而实际目的地是武汉。继续出发，由敞亮的客车改为闷罐子货车，因战事而走走停停，遇到国民党飞机盘旋，就下车分散到庄稼地躲避。那时，我们已经体会到没有空军就会吃大亏。

到达漯河时，电波传来5月16日武汉解放的喜讯，我们无不振奋。由于铁路炸断，要求我们轻装前进，将背包控制在八斤之内，只好扔掉一些衣物书籍，步行赶到“四野”下属的朝鲜族运输团，改乘卡车翻山越岭，在崎岖的路上奔向江城。

初进武汉经受“考验”

1949年5月23日，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哈尔滨干部教导大队进入武汉。

车到黄陂岱家山附近，不时还有地雷爆炸声传来，张公堤上敌军碉堡一个接一个。行进到黄浦路“陆军医院”前，遇见数百人队伍摇着彩旗、高呼口号欢迎我们，我们兴奋地以嘹亮的歌声回报，气氛很是热烈。

入夜，我所在进驻市委机关的分队，住进中山大道、车站路交汇处的万国旅社，接管城市的战斗生活开始了。但绝没想到，

解放前分别设市的汉口、武昌刚刚统一为武汉市，社会经济千疮百孔，白手起家十分艰辛。听说汉口为商业区、武昌为文化区、汉阳为工业区，我特意到工业区汉阳去看看。我和两位战友赶到汉江边，坐小划子过江，上岸发现街道很窄，路边都是又矮又小形状各异的平房。所谓的“工业”不过是一些手工业小作坊，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人力车，汉阳区政府在一座庙宇办公。

与哈尔滨截然不同，武汉天气湿闷炎酷，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无法想象。武汉市委警卫排由我们教导大队七中队组建而成，每天站岗几小时，晒烤得皮肤黝黑，只觉酷暑难耐，有的不得不一天冲凉六七次。还有苍蝇蚊子乱飞，因汉口属于江北，按财经规定不发蚊帐，经特别争取才发了下来，可有方形圆形两种。方形蚊帐用竹竿四角一撑就行了，圆形就叫人犯难了：这可咋睡呀？难道站着睡？后来知道蚊帐顶上有一个挂带，往屋梁的钉子一挂就行了，现在想来都忍俊不禁。

对一名刚满18岁的小青年来说，这些都不是小插曲，而是一个个“考验”。当我走上第一个岗位——武汉市委管理科任管理股副股长时，人地生疏，却要负责全机关的生活保障，一切得从头开始。

那时百废待举，为节约开支，我们的生活标准不断下调，每餐只够“馒头咸菜”。管理股想方设法改善伙食，但由于执行进城公告中“买卖公平”的承诺，买菜时从不还价，钱就更不够用了。更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造成币制极为混乱的后遗症，黄金、银元、外币、金元券和人民币同时流通，人民币却处于辅币地位，有的甚至拒收，导致物价飙涨。为了保障生活、稳定民心，政府出台临时性工分制，以人民币为

基础，其含量包括日用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布等，加上坚决取缔银元交易、不得拒收人民币等一系列举措，立刻收到成效。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打听到批发市场，起早床直接去采购物资，大大降低开支，保证大家的基本营养水平。

经受这样的考验，我慢慢学会管理城市的经验，虽然工作岗位变换频繁，也能举一反三适应新任务。1949年底，我回到老本行市税务局人事科，主要负责共青团工作。因此，一个时期在市政团委、区团委、市直机关团委打转，职务由副书记到组织部长上上下下，毫无怨言。1952年，任市直机关党委干部科科长。1956年，任市工业党委副书记，转岗到了工业战线。

武汉机床厂迎来朱德副主席视察

1957年7月，组织上派我去武汉机床厂先任工会主席，后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那年我26岁。由于有过党委、政府、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经历，我不免开玩笑说：“党政工团都干过，就差妇联了。”



1958年，朱德副主席视察武汉机床厂，佟心（右三）参与接待

企业工会工作是新挑战，好在厂工会组织很健全，设有生产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女工委员会等七八个委员会，依靠职工群众参与管理，工作起来很顺当。

武汉机床厂是在48家五金小作坊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大型国有机械企业，职工有3000多人。解放前，一家小作坊，仅一两台机床、三四个工人。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政府投入资金、添置设备扩大再生产，才初具规模。进厂时，我看见还有老掉牙的皮带式机床在运转。

尽管如此，大家热情高、干劲大，不管承担多重的生产任务，都能千方百计完成。遇到要啃硬骨头，立刻召开“诸葛亮会”，群策群力攻关解决。著名劳模、武汉重型机床厂马学礼来厂作报告，他“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事迹，对大家的鼓舞很大，一门心思要把生产搞上去。

1957年，印度举办国际机械展览会，国家一机部指定武汉机床厂的磨床送展，全厂动员齐心协力，产品质量精益求精，深知这项任务代表国家荣誉。参展产品托运前，工人们像嫁姑娘一样兴高采烈，挂标语，拉彩旗，敲锣打鼓为它送行，热闹非凡。

展览结束后，参展人员回来汇报说，我们的产品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怀疑：中国能生产出这么优质的机床吗？为此，竟然派人晚上偷偷摸摸到机床旁，试图敲掉上面的标牌“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机床厂”，以证明我们是在他国机床焊上标牌冒充的。可机床就是我们厂铸造的，他们当然敲不掉，这更让我们增强了为国增光的自豪感。

1958年，市里要求各厂的产量指标，在上年的基础上“翻番再拐个弯”。工人们积极响应，因为那时国家穷啊、落后啊，觉得能让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再辛苦也值了。大家真是没日没夜干，终于实现了既定目标，向市机械局送去了喜报，《长江日报》也发了消息。

秋后的一天，市委通知派一名厂级领导，晚上去洪山礼堂参加晚会。厂里派我去，集合地点在市委，到的都是各委办局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有人猜测：不会是去见毛主席吧？

果然被猜中了！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毛主席向我们走来，顷刻间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落座后，又一次站了起来，向四周挥手致意。晚会准时开始，由汉剧大师陈伯华领衔主演《宇宙锋》，毛主席同大家一起聚精会神观看。

12月14日，中央副主席朱德在武昌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后，来我们厂视察。在市委书记处书记宋一平的陪同下，朱老总进厂后兴致勃勃，直奔生产车间。见到岗位上操作的工人们，他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向大家问候：“辛苦了！”工人们非常激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车间出来后，朱老总到会议室听取厂领导工作汇报。当他得知这家厂原先仅能生产小五金零配件，而今能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半自动滚刀磨床共五个系列十多个品种时，高兴地赞扬说：没有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不能发展到这个样子。又叮嘱说：你们不能满足现状，要更好地学习和提高管理水平，为国家搞出一批尖端产品来。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还要培养出更多的尖端人才！

这期间，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陈克东带领工作组来厂蹲点，对我们厂热火朝天的



1959年，佟心（右一）参加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德国、波兰等国

气象看在眼里。1959年4月，经陈克东推荐，我参加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许之桢率领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到东德、波兰进行友好访问，同时顺访途经的蒙古和苏联。在东德，我们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和庆祝游行活动，与工会同行进行了友好交流。时逢中国军事代表团正在东德访问，我们有幸参加大使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一睹彭德怀元帅、王树声大将和肖华、杨得志、张宗逊、许世友、陈伯均上将的将帅风采。

出访回国不久，我的工作岗位发生较大跨度的变动，从工业战线调到新闻战线，先后任长江日报社群工部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评论部主任和社党委副书记。1975年调任武汉广播局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二线回长江日报社任顾问，直至离休。

佟心，离休老干部，政协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曾任长江日报社、武汉广播局党委副书记

武汉抗战孩子剧团拾零

◇ 王豫丰 吴文俊

孩子剧团是在上海成立、在武汉成长壮大的一个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爆发，9月3日孩子剧团在战火中正式成立，由几个孩子发展成为数十人的团体。中共党员吴新稼（吴莆生）任干事长（后改称团长），吴新稼、许森、张莺、陈模、张承祖5人为干事会干事。

一

剧团一成立，团长吴新稼就创作了《孩子剧团团歌》的歌词，由郭映艇谱曲，孩子剧团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引起了热烈反响。

1937年11月12日，日寇占领上海。上海国难教育社中共党组书记、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委员王洞若，在孩子剧团30多个团员中，挑选19个抗日坚定、身体较好的孩子组队，委派吴新稼带到我国中部大都市、抗战中心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团员中，年龄最小的8岁，吴新稼最大19岁。后来，王洞若又介绍3人来团，其中有一位党员林梨田。组织上给330多元作路费，让他们到武汉后找《抗战教育》杂志社接头。

为了逃出吴淞口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孩子剧团22人（其中3个女孩子）化整为零，乔装成难民孩子（最小的团员托付离沪的大人以儿女身份携往），18日至23日分5批乘船离沪，在南通天生港聚齐。他们背着行

囊，一路行军，一路演出，历时一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于1938年1月10日晚到达武汉大智门车站。

接站的是《抗战教育》杂志社地下党员陆维特，他兴奋地说：“我们真为你们的安全担心！你们终于冲出了日寇的虎口，越过了兵荒马乱的火线，一个不少，反倒增加了三位，平安到达武汉，真叫人高兴啊。”孩子剧团在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住下。

二

孩子剧团初到武汉，人地生疏，经费缺乏，吃饭治病。都成了问题。听闻此讯，1938年1月的一天上午，邓颖超带着孟庆树和周恩来的警卫员吴志坚，来到孩子剧团看望。她和蔼亲切地说：“孩子们，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来看望大家，你们辛苦了！”孩子们欣喜万分，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喊着：“邓妈妈好！”

邓颖超在孩子们中坐下来，详细问了他们从上海到武汉的经过，赞扬他们人小志气大，接着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小鬼”英勇斗争的故事，激励他们继续勇敢地斗争下去。

几个小病号躺在隔壁教室里，邓颖超来到他们身边，问生了什么病、服过什么药，又问他们想不

想家。8岁的裴黎小声说：“为了打鬼子，才离开家，想也没法子。”邓颖超听了这天真的话，笑起来了，称赞他：“小小年纪，有志气，是个好孩子。”

几天后，邓颖超又来看望孩子们。她说：“听说你们生活困难，办事处的同志从零用钱中。捐给你们60多元，又从社会上募捐了128元，给你们治病，添补衣服、棉被，改善生活。”

以后，邓颖超又去看过他们，帮助孩子们安排好生活、学习和工作。

1月30日，周恩来派吴志坚乘一辆大卡车，特意把孩子们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叶剑英、叶挺、博古、邓颖超、郭沫若等给了孩子们许多教诲。周恩来赞赏孩子们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的精神，要他们“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并送给他们“救国、革命、创造”六个大字，让他们永远要记住这三种革命精神。郭沫若激动地说：“中国有了你们这样不怕艰苦的儿女，也要从苦难中逐渐长大起来！”



邓颖超（左二）与孩子剧团成员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门前合影

孩子剧团听说冼星海在武汉，就请他来教歌。冼星海教孩子们唱了两首新歌：一首是《祖国的孩子们》，另一首是《游击军》。后来，冼星海又来孩子剧团，教孩子们唱他新创作的歌曲《赞美新中国》。

三

一天，国民党市党部突然通知收编孩子剧团，说是宿舍已准备好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派卡车来接，命孩子们把行李都搬到市党部去……

吴新稼闻讯急忙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邓颖超作了汇报。半夜12点多钟，周恩来回后，吴新稼又赶紧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问：抗日救亡协会的演剧队是不是在黄石石灰窑，走水路到石灰窑有多远，去石灰窑的船几点钟开，船票好不好买，钱够不够用？吴新稼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说：“明天一清早，你们就搭第一班船去石灰窑，那里是矿区，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救亡演剧队的同志们也在那里，好照顾和帮助你们。那里离汉口比较近，有事好联系。你们全都走，一个人也不要留。有人问，就说到工人区做抗日宣传工作。在那里待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后再回来。到那时看看情况再说。”

回团后，吴新稼立即召开干事会，传达周恩来指示，部署撤离的紧急行动。凌晨3点钟，守夜的“值日生”轻声把孩子们叫了起来。大家紧张地迅速收拾东西，不到4点捆好了行装，挑着服装道具，踏着路边暗淡的灯光，悄悄奔向码头。上午10点抵达目的地，抗敌演剧一队、二队和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的大哥哥、大姐姐唱着新编的《欢迎歌》，在码头迎接孩子剧团。

4月初，孩子剧团从石灰窑回到汉口，积极参加4月4日儿童节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七八天后，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辛汉文来到孩子剧团找吴新稼，递给他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陈诚。”原来，这条子是三厅厅长郭沫若亲自找陈诚写的。辛汉文说：“以后你们就隶属三厅了，是郭老派我来接你们的。”

孩子剧团搬进了武昌昙华林三厅驻地，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在门口迎接。这样，孩子剧团反对国民党强迫收编的斗争，在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的领导关怀下，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周恩来和郭沫若来看望孩子剧团，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此后派来指导员陈乃昌、蔡家桂（蔡馥生）和艺术指导员郑君里，上政治课，组织文化学习，做思想工作，指导演出活动。孩子们每天上午学习，开语文、算术、英语三门课，另外学习戏剧、音乐基础知识。团里工作由吴新稼抓，讲课教师由陈乃昌来请。陈乃昌请来语言学专家常任侠任语文老师，英语造诣较深的曹荻秋任英语老师。郭沫若还请来徐特立老人，给孩子们讲学习态度与方法。

三厅同时收编了长沙儿童剧团，与武汉孩子剧团合并。此时，孩子剧团已发展为60人，分成两个队，郭沫若为之配备了郝玲星、丁秋月 and 方黎等助理员管理生活，帮助孩子们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团里还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分别组成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文学组、自然组，由孩子们自愿选择参加，并请三厅的“大先生”和专家辅导。

郭沫若和田汉、阳翰笙、洪深等几位戏剧家，筹划成立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

在昙华林举办队员集训班。孩子剧团也是受训团队之一，并在昙华林大院长廊办了《学习园地》墙报。郭沫若虽公务缠身，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墙报。他看得十分认真仔细，还提笔改正墙报中不通顺的文句和错别字。

四

1938年4月初，三厅地下党特别支部决定在进步文化人士中，布置发展党员的工作。为此，王洞若同志约见吴新稼，并慎重地说：“最近周副主席指示，武汉地区有许多人要求入党，可以发展一批。三厅可以发展，你们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

吴新稼问：“有什么要求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呢？”王洞若说：“只要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愿意服从党的领导，积极、坚定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遵守党的纪律就可以了。至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可以在入党以后进行教育……你们去提个名单来吧。”

吴新稼回来后，立即找到许翰如传达指示，讨论入党人员，最后王洞若确定张承祖（张宗祖）、张浣青（女）、张莺（女）、许立明（许森）、罗真理（罗立韵，女）、陈模、徐祥先（后脱党）7人。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是张承祖、张浣青17岁，最小的是陈模、罗立韵只有15岁。

1938年5月初的一个上午，孩子剧团的三个女孩子张浣青、张莺和罗立韵，在王洞若的

住处面对党旗站成一排，由介绍人吴新稼站在排头，举起右臂庄严宣誓。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入党仪式分男女两次进行，入党介绍人都是吴新稼，候补期半年。宣誓以后，孩子剧团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吴新稼、组织委员许翰如、宣传委员张莺、青年委员许立明、保卫委员张宗祖，编了两个党小组。

五

孩子剧团初到武汉时，《新华日报》连续三天进行了报道，产生广泛影响，邀请孩子剧团演出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

孩子剧团在武汉后的第一次演出，是1938年5月参加武汉救亡歌咏大会。孩子剧团唱《团歌》，主持三厅音乐科的冼星海，给了孩子们很多鼓励。他要孩子们专为他唱一次《团歌》，听得很仔细，提出一些中肯意见，如歌曲结尾要坚强有力，“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中的“新世界”三字要唱出最强音，改进后收到很好的效果。



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叶挺等与孩子剧团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屋顶合影

在郭沫若领导下，孩子剧团还参加了三厅主持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歌咏大会、戏剧演出、电影放映、漫画展览等。此后，参加过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和江上歌咏大会。

孩子剧团联络了新安旅行团、抗战儿童读书会、七七少年剧团、中国儿童救济会、儿童救国团、青救儿童先锋队、青救儿童剧团、中国童子军岳武穆队等文化社团，以及一些中小学代表等，经常开会活动。

孩子剧团还以各儿童团体的名义，发电报给法国巴黎反轰炸大会，声援他们保卫和平、保卫妇女儿童的正行行为。在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时，各儿童团体又联合组织了抢救儿童工作队，到战区进行抢救儿童的工作……

1938年7月6日的晚上，团长吴新稼向全体团员宣布：明天要早起，一早去汉口，参加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保卫大武汉！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第二天清早，团员们便乘船过江，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大孩子把“孩子剧团保卫大武汉献金运动歌咏队”巨大横幅，举得高高绷得紧紧，合唱队整齐分列于献金台两侧，雄壮的童声合唱激越回荡。

人们络绎不绝步上献金台，汇成一条缓缓涌动的人流，见首不见尾。最初，这人流里还是一些小职员、小学生，捐的钱数额不多。但他们神圣庄重地献出微薄力量，对孩子剧团所有小战士鼓舞很大，大家劲头更足、嗓门更高了。

这时，团长吴新稼叫团员停止合唱，分头到人群中去直接宣传献金，扩大“成果”。吴依临时给李少清当“妹妹”。李少清是安徽沦陷区的人，刚从沦陷的家乡徒步

700里来加入孩子剧团。他平时不多语，可是那天讲日寇的暴行、家乡的惨状、难童的遭遇，如泣如诉悲壮激烈，唤起群众的国仇家恨。

1938年8月，在武汉失守前夕，孩子剧团随三厅撤退，由杜国庠率领到湖南衡山一个多月。湖北战事紧张，参战的伤员撤到长沙，三厅派孩子剧团奔赴长沙，开展抗战动员和救护伤兵工作。长沙抗战危急时，周恩来、郭沫若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在三厅军用车辆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一部车，将40多位团员作为第一批撤退人员撤到了衡阳市，后又撤退到广西桂林。12月下旬，孩子剧团奉命随三厅经贵州，于1939年1月9日到重庆海棠溪。

1942年9月15日，随着时局的变化，孩子剧团在重庆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存在共5年时间。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名称的孩子剧团、儿童剧团、娃娃剧团、儿童抗日宣传队等儿童团体。这些团体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孩子剧团的启示和影响，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各地组织成立的儿童团体就有150多个，它们像满天星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天幕上闪耀光芒。

王豫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吴文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文博馆员

《围垦生活》再现东西湖围垦工程

◇ 王弘宇

《围垦生活》1957年11月22日创刊，是中共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委员会的机关报，由围垦工程政治部主办，设有专门编辑室主编。编辑室的地址在黄陂黄陂，发行对象为参加围垦工程的民工、义务劳动大军和机关干部。

《围垦生活》每周二、五出版，每期4版，共出版38期，收稿件2000余篇，由工地160多位通讯员提供。1958年4月4日终刊，但5月7日又编辑出版《庆祝围垦工程竣工专刊》一期。

《围垦生活》第1—3版，主要刊发有关围垦工程的决定、命令、指示和措施，反映党和政府对围垦工程的关怀、围垦战线的工作进展、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党团和群众组织的活动，同时也刊登评论、文艺作品和宣传演出材料。第4版，主要报道国际国内大事，让大家及时了解时事形势。它既是

宣传阵地也是学习课堂，为推动东西湖围垦工程取得胜利，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围垦东西湖，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列入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湖北省重点水利工程，也是10万大军艰苦劳动、建设家园的重大工程。《围垦生活》作为工程领导机构主办的唯一报纸，真实记录了党政军民学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是蕴含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重要档案。

时光荏苒，《围垦生活》仅有一套原件作为珍藏档案，保存于东西湖区档案馆。

全面记录工程建设的壮阔历程

《围垦生活》5个月出版38期，伴随东西湖围垦工程建设全程，紧密跟进工程的实际进度，及时关注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

配合做好相关宣传报道，充分发挥了定调、定向和定心的作用。

展开一个个版面，可见其报道轨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报道，关注施工准备进展。

《围垦生活》创刊号一经问世，就以发刊词《行动起来，做好全面施工准备工作》开篇，与围垦工程一起拉开序幕。初期的报道，主要介绍垦区概况、工程规模、主要效益、任务目标，大力宣传东西湖农场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意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报纸详细报道工程计划、工棚搭盖、器材筹措、生活供应、劳动力动员组织和机构、干部方面的准备情况。创刊当天，及时刊登头一天围垦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分部（所）指挥长和政委扩大会议的摘要，从5个方面反映施工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内容朴实而鲜活：

要搭起十几万人住的工棚却不简单，大部分又不能就地取材，如楠竹和稻草就大部分是从外地运来，但我们都按期完成了任务。

粮食、柴草、油、盐等，一部分已运到了工地，正在根据上级要求争取储存一个月至二个月的主要物资，我们的运输工具非常缺乏，地区交通很不方便。

我们的机构已经成立了，干部也已经大部分到达了工地，开展了工作，情绪都很高，大家都表示了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这都是很宝贵的。

技术设计任务也基本都完成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少，但同志们努力完成任务。

我们的“兵”——民工已经陆续开来了，不仅工地附近来了，几百里山区的也来了，数字也接近计划，队伍很整齐、很精壮。



《围垦生活》创刊号和《庆祝围垦工程竣工专刊》

对于施工前期准备的报道，充分体现了各级重视、各方支援、全体人员的顽强奋战，起到了增强信心、鼓舞干劲的作用。

第二阶段报道，聚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1957年12月24日，《围垦生活》刊发围垦工程党委第一书记伍能光的报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全线施工高潮，争取按期或提前完成任务》，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活动。

这一阶段，主要宣传贯彻围垦工程民工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刊登《紧密团结，提高工效，增加收入，保证完成工程任务》等会议报告，明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同时公布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织生产高潮，保证任务完成的联合指示》《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暂行办法》《东西湖围垦工程民工、干部奖惩条例》等文件，对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的全面部署安排，激励大家与洪水抢工期，实现既定目标。

工地马上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比劳动工效，比工程质量，比劳动纪律，比勤俭

节约，比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因此，《开展轰轰烈烈的红旗竞赛》《青年突击队是怎么提高工效的？》《创工地最高工效记录》《全线平均工效已突破标工》等主题报道占据大幅版面，营造出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积极氛围。

第三阶段报道，扭转麻痹松劲不良倾向。

工程进入决战时期，出现一些骄傲自满、草率收兵、急于回家等思想情绪。为此，报道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集中反对麻痹松劲，引导再接再厉推向新高潮；二是指导各分部全面检查工程质量，做好清工结算工作，避免出现只顾抢工效而不顾质量的现象；三是报道各大队相互支援的情况，宣传以先进带后边的办法，提高整体工效。

生动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优势

东西湖本地人烟稀少，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围垦这样巨大的工程。《围垦生活》站位较高，大量报道工程如何统揽全局、凝聚合力的生动事实，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胆识和成效。

从大量报道中不难看到，围垦工程是高效配置资源、集结多方力量、形成人财物优质供给的一大壮举。武汉市先后动员组织了6万余人分批义务劳动；湖北省调集了孝感、黄冈两地区18县民工；河南省动员组织民工支援建设；中央军委派遣部队官兵义务劳动。截至1957年12月，湖北、河南两省上堤的民工加上义务劳动人员，合计达12万人。

在物资供应保障方面，武汉市供销土产经理部派出20多人的采购队，分赴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采购了大量楠竹、芦席、油毡、竹片、土箕、棕绳及上千吨铁丝、圆

钉等，提前运到工地。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积极主动，尽先运输，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口号，克服了荒湖无路等困难，及时将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工地。武汉市百货、副食、餐馆、邮电所等部门，均在工地设点服务民工。省市卫生系统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工地医院，为民工提供巡回义诊。

兴建乳牛场，中央号召各地大力支援，很快从内蒙和北京运进第一批430头良种奶牛。开荒造田，从辽宁省调来10台最好的拖拉机和60名优秀拖拉机手、农具手，帮助开荒播种。

通过《围垦生活》的宣传报道，我们看到了党领导下的强大国家动员体系和社会组织能力，让人真切感受到东西湖围垦工程之所以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深刻反映艰苦奋斗的围垦精神

时间无言，但《围垦生活》上热火朝天开展工程建设的动人画面，留下了艰苦奋斗、求实创新、开放包容的围垦精神基因。

《围垦生活》没有回避工程中存在的困难：任务大，时间紧，需要动员组织10多万人在次年农忙和洪水到来之前，在短短5个月内围堤造田。同时保障工程材料、生活物资等供应，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运输条件不好，施工技术人员缺乏，施工又处于冬季，困难确实很多。在我国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无异于严峻的挑战，但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凝聚起众志成城、风雨无阻的磅礴力量。

初到湖区生活艰苦，住的是简陋工棚，睡的是稻草地铺，烧火煮饭就在地上挖土垒



《围垦生活》内页插图

灶。《在劳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却用颇具浪漫主义的笔法写道：“义务劳动的工地上，既没有宽敞的办公室、食堂和宿舍，更没有平坦的柏油马路、坐公用汽车上下班。这里只有芦席搭盖的工棚，一字形排列的堤角上，办公室是宽阔的荒野，土箕和铁锹代替了办公和学习的笔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胆怯，因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从劳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对于从外地来支援的民工，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关，就是遥远的路程。《千里而来的一支生力军》记录了第一批河南民工跋山涉水赶赴工地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在围垦动员报告传达到的三四天内，商丘县有十四万多人报名。坐火车到江岸车站后，雨还在下着，从岱家山到黄花涝长达三十多里的烂泥路上，路滑得停不住脚。这并没有阻挡住他们奔向工地的雄心，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艰苦奋斗。在风雨的寒夜里，老乡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泥浆前进。鞋子掉了，打赤脚走，赤脚被石块钉破了，衣服淋透了，这都没啥。跌倒了三次、四次，爬起来，又走。有个青年团员跌倒了上百次，爬起来还抢着给别人背行李。从下午三点走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才到了黄花涝。”

工程初期正是冬天，雨雪交加，寒风刺骨，气候十分恶劣。围垦大军泡在荒湖水塘中，挖淤泥，割苇草，挑土清基，就算腰酸腿痛、肩膀红肿、手上打起血泡，仍坚持战斗不叫苦和累，始终斗志昂扬。《紧张的劳动愉快的生活》生动描述了施工现场繁忙的景象：“挑土的行列像无数条绳索，来来

往往的穿织在一起，劳动的歌声，欢笑声和拖拉机轧轧的响声，揉合成了热情洋溢的乐曲，数十面鲜红的队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白衣战士们到处奔忙。”

打开报纸，《跟风雨作战向荒湖要粮的青年突击队》《日夜奔驰在东西湖荒原上的拖拉机队》《日夜巡回值班的医疗队》《冷水里抢救竹排和民船的民工》等令人动容的事迹，加上以围垦为主题创作的曲艺、诗歌等文艺作品，都洋溢着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豪情，向读者生动展示了人民的力量。

《围垦生活》作为珍藏档案资料，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它所刊登的东西湖围堤建场等先进经验，对开展重大工程建设仍有查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同时，《围垦生活》也是了解东西湖发展历史的生动素材，是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鲜活读本，其承载的围垦精神将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王弘宇，武汉市东西湖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裴传雯教授的“那一句”

◇ 周希正

毕业多年，离开一起成长的同窗，告别辛勤耕耘的老师，对武汉音乐学院的母校情结无尽缠绕。都司湖边那条小路，图书馆后的小花园，师范学院办公楼旁那颗樱桃树，依然那么熟悉，仿佛就在昨天。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回到那里，走过琴房教室，耳边萦绕着当年的歌声，恩师裴传雯教导我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带我重回难忘的追梦岁月。

那一句“你唱得蛮有味”

每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对歌唱舞台的向往是天性。年轻的时候，和一帮喜欢音乐的伙伴成立乐队，我作为主唱，在

舞台演唱《巴比伦河》《阿里巴巴》等流行歌曲不亦乐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播出过我演唱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射



1990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裴传雯与作者

雕英雄传》主题曲和《请跟我来》。

那个时期，为了演出效果，我什么流行就唱什么，不知用嗓的深浅，不久高音区出了问题，嗓子长期嘶哑。乐队的民歌手李琦说：“你的声音现在成了沙嘶疲哑，这样唱嗓子迟早会坏掉的，我帮你介绍一个蛮好的声乐老师。”

初次见到武汉音乐学院裴传雯老师的情境历历在目。我在老师的琴房紧张地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后，见老师没有说话，李琦急了，连忙说：“今天没有发挥好，他在舞台上感觉非常好”。我也忐忑不安，等老师说话。裴老师和蔼地慢慢说：“流行歌曲你唱的蛮有味道，我们可以切磋不同的唱法。”“啊！”老师要和我“切磋”，是不是等于我可以在老师这里上声乐课了？我这样想，不停地点头。李琦见我傻傻的样子，又急了：“快跟老师约定时间，什么时候来上课？”

从我作为歌手登台的那天开始，一直就梦想能够找到一位在歌唱技艺上给我引路的高人。见过许多老师，可能是我的声乐基础不好，更多是没有师生缘分吧，我对学好声乐已经不抱希望了。裴老师那一句“你唱得蛮有味”，重新激起我对学好声乐的渴望，成了我们师徒二人一辈子的缘起。

今天，当我回望那段日子，那些平常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在时光的研磨下，成了我对恩师最温馨的记忆。

那一句“你蛮灵活”

每一位声乐老师都知道，高喉位歌唱意味着喉部肌肉紧张，捏着喉唱歌是美声唱法的大忌，尤其是男高音有了这样的毛病，改掉很难。教这样的学生，是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

放喉头——解决声乐教学中公认的难题，是衡量声乐教学尺度的一大标准。对此，声乐教学界许多“名师”，在教学中会找各种理由，如学生天生是高喉位或学生天生没有高音而回避。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老师极大的爱心和耐心，而且不能够马上出成果。在目前声乐教学圈浮躁的大环境下，没有人愿意去真正钻研解决喉头的问题。

我很庆幸裴老师收我为徒。她有一套原则和有效的训练方法，在抽象的声乐演唱中，强调歌唱随心象，自由流淌。同时巧妙转换思维，迂回突破，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解决了我学习声乐的最大难题。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她为了改掉我的高喉位，在课堂上从不说我高喉位，重点训练在气息流动中轻松歌唱，让我的歌唱追求自然而然的放松，



2021年12月8日，作者在琴台音乐厅演唱

在放松中观察我紧张的根源在哪，并将这种观察延续到课堂之外。

一次我打篮球，老师看了一会儿。第二天上声乐课，她说：“你打篮球蛮灵活，是因为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争抢篮球上。唱歌就像你打篮球那样，专注呼吸的流动，你试试？”那堂课我唱的是《码头工人歌》，在衬词“嘿、依哟嘿”部分，她让我在腰上找“狗喘气”，把腰上从没用过的力量加入歌唱，声音果然流畅起来。然后她说：“你再到镜子前看看，喉位在哪里？”

啊！神奇的声乐课讲篮球。许多人一辈子都难以放下的喉位，许多专家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专著的问题——用横膈膜歌唱，就这样被老师解决。她用通俗易懂的声乐语言，将最难的声乐问题变得如此简单。

松弛的低喉位歌唱，是老师教我歌唱中最实用的法宝，打通了我通向美声唱法的必经之路。那一年我毕业，老师由于担任声乐教学负责人，没有时间再教我这个走出校门的学生了，就介绍我到杨金岚老师那儿学习。杨老师说：“你的喉位稳，所以你的高音蛮好。”直到今天，我还能够唱出松弛的高音。当有人夸我的声音年轻、音色漂亮时，我会自豪地说：“是老师为我打下坚实的歌唱基础。”

那一句“你怎么傻里傻瓜”

声乐演唱的基础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歌者对声乐艺术全面解析的能力。老师的基础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调动歌者演唱思考的主观能动力上入手，实现技术的提高，让歌者成为技术的主宰。这种授人以渔的训练手段，让我们从基础阶段就养成了声乐思考的习惯。那些带着问号歌唱

的日子，老师扶正我前行的一件件小事，温馨画面如同母子情谊。

学习声乐，对于我来说是格外珍惜的事。为了上好声乐课，保持头脑清醒，每次上课之前，我都会用凉水冲一下太阳穴。老师开始没注意，后来诧异地问我，你怎么每次都湿漉漉的来上课？我说：“我要记住您在课堂上的每句话，所以用凉水冲冲保持清醒。”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很爱惜地说：“小心感冒了，学习用功是对的，但我不要你这样傻里傻瓜。”

可能从这时起，老师发现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将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重点，学习就抓不住重点。因此，她不希望她的弟子用这样的“傻劲”去学习。当我演唱再冒“傻劲”的时候，她都要说：“你怎么又傻里傻瓜。”每当听到这样通俗的“鼓励”，我马上意识到，每一句都唱得“太实在”了。为了让我养成轻重缓急处理得当的歌唱素养，老师拜托师姐刘惠娟的先生赵汉宁老师，在伴奏的时候盯着我：“周希正，听这里的伴奏和声，注意伴奏与旋律的走向，乐句与语句有统一、有过渡。”同时，还让我观摩赵老师与刘惠娟在合伴奏中如何分析作品，对我声乐综合能力的训练可谓费尽心血。

为了拓宽我们的艺术思维，老师动员“师爸”汪良田，用摄像机拍摄我们的演唱过程。每次考试走台，汪老师用他美术家的视角，为我们分析歌唱的画面感，开拓了声乐艺术审美的视野。汪老师专门告诉我：“我们美术作品讲究构图、色彩、光影，通过这些元素变化，传达某种寓意化的情感。周希正，你唱歌没有味道，不讲究作品的整体结构，就如没有色彩、光影的变化。缺乏美术讲究的画面感，所以没有情感的表现——没有味道。”

一席话醍醐灌顶。美声唱法的共性，还可以用个性来作另一个诠释：“用声音的色彩和舒缓来表现歌唱情感，从而使声乐作品充满画面感。”从那时开始，我的每次歌唱，都会注意寻找作品隐藏的画面感，力求表达最符合作品的情感。

音乐家与美术家伉俪，教给我音符、节奏、色彩、线条多维的艺术语言，在呼吸、共鸣、光影、画面中，寻找唱歌的“味道”。老师和谐的家庭艺术氛围，让声乐教学变得有色彩而不单调。艺术的相通，让我在诠释歌唱美学特征时，多了一种武器。这种复合的艺术思维方式，影响了我的艺术人生。从生活到艺术、从琴房到舞台，这样家人般的教学氛围、这样高规格的艺术教育，不是音乐学院的学生都能够有机会享受的。

我的追梦从琴房到舞台再到讲坛，艺术足迹从歌唱本体到文化探源再到传承创新，艺术形式从流行到美声再到地方戏曲，是一种从平面到立体、基础到高级的全面蜕变。

那一句“我可以不管你了”

家人的含义，就是在你生活、工作中遇到不如意，你会第一时间向她倾诉，她在你心里就是避风的港湾。

从做学生到做教师，学校与学校意义完全不同；从被爱到付出爱，角色的转变有许多不适应。初为人师，面对周围种种不再单纯的关系，心里从来不设防的我，被捅得不知所措。工作中的挫折，生活中的苦恼，是我忘不了的人生成长第一课。

感恩我的老师在我迷茫、困惑之时，静静地听我述说，然后用她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做事！就像你唱歌那样专注。你越是遇到困难，越要昂起头来。同时，你现在不

是学生，要注意将你的演唱与你的教学结合起来，注意你的文笔。”

老师简单、朴实的话语，让我懂得了做事、做人的道理。

工作几十年，我一直都专注我喜欢的歌唱事业，像老师那样一如既往，将教学从讲台延伸到舞台。艺术实践与学术研究，不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在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海南师范学院等高校与同行交流学术心得；在大别山腹地田野采风，与当地民间歌手共同歌唱；在韩国、新加坡、香港、北京等地音乐厅进行艺术实践。

一路歌唱一路探索，也记住老师“注意你的文笔”的叮咛，将多姿多彩的艺术实践，勤笔耕作转化为理论研究。从《歌唱演员舞台魅力解析》到《湖北小曲演唱特征》《汉剧声腔对民族声乐教学借鉴与融合》等文章，让我从一个单纯的歌者，逐渐成为多方面的探索者。

同时，我对于歌唱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每次演唱内心的画面更加丰满，眼神变得有内容，这一点老师最清楚。有一次我去看望老师时，她对我说：“你现在成熟了。我可以不管你了。”

可是老师这句“不管”一直没有“兑现”，那一年我评职称，评审会结束，第一个关心鼓励的电话就是她打给我的：“相信自己、不要功利。”在琴台音乐厅偶遇老师，老师在音乐会间隙，还对我发表的文章正航指津，告诫我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探寻艺术的本质。

老师就是这样“不管”而让我受益，在我的求职、任教、评职称、恋爱等重要时刻，从最初的电话、信息、微信、朋友圈到抖音，“不管”也与时俱进。我更乐于将自



2021年11月，裴传雯教授与作者在琴台音乐厅

己的艺术心得、理论研究成果与老师分享。在老师的眼里，希望我永远都是那个唇红齿白的青涩少年。

这一句“老师我们爱您”

老师的班上有一个有趣现象：同门毕业后分散到各地，几十年后各成“一方诸侯”，十多位担任了武汉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院校声乐系的“掌门人”，更多是活跃讲台的声乐教授……

一位教育家曾说“学校是大海，孩子是鱼，大海里有了千姿百态的鱼，才充满了生命力”，老师的课堂也的确如此。老师作为声乐教育家（这里我要违背老师的一贯低调，按照弟子们的真实想法这样称呼），在几十年的艺术教育中建树卓著，体现在对于声乐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

我记得：当年万敬之师兄与王萍大姐热恋，老师为了他专心练声，每天晚餐后搬一个凳子，拿一把蒲扇守在琴房门口，盯着师兄练声，然后再放行他去约会。

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关爱，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黄灏师弟也许不知道，老师曾经给我讲他学习声乐的艰苦经历，当时泪水布满眼眶的神情，至今还触动着我的心。

吴筱玲师妹提起老师，总是说她像妈妈一样。有一次，师妹生病在寝室，老师特意送药给她，让她在远离家乡之际，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什么是母爱？老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就是最伟大的母爱！我们终身难忘！

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喜欢的事成为自己的工作，爱好成为自己的事业。在歌唱舞台上抒发人生，在歌唱教学中解惑答疑，享受着穿行舞台与讲台的快乐。这一切源于我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恩师裴传雯先生。从我学生时代、初为人师直到现在，我忘不了老师对我无数“那一次”的鞭策与期待，正像一首歌名《你鼓舞了我》！

千言万语，化作这一句：“老师我们爱您！”

周希正，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大武汉让我们不负年华

◇ 于天宝

人物名片：于天宝，吉林人，众创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新媒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党支部书记。

2001年9月，我第一次离开白山黑水的故土，只身一人踏上远赴大江大湖的旅途。二十多年，我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创业。忘不了桂子山上的谆谆教诲，忘不了大花岭上的三尺讲台，忘不了长江网的通宵灯火，更忘不了百步亭十年历练。走遍整个武汉，领略着老汉口的历史风情，见证着大光谷的日新月异，江城不再分南北，他乡早已成故乡，大武汉让我们不负年华……

让数字经济赋能智慧城市

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所学专业可以说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毫不

沾边。但有些事可能就是来自偶然，这个偶然是高中时就帮打字社维修电脑，帮网吧部署局域网；这个偶然是大学时帮学院维护多媒体教室，帮同学修电脑做课件；这个偶然是工作期间担任创业导师，带领学生互联网创业……这一切偶然，让我与互联网结缘，与数字技术结缘，与数字经济结缘。

2007年，我加盟武汉长江互动传媒网，并迅速成长为编辑部主任。新闻宣传不仅需要深厚的写作功力，还需要敏锐的策划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参与策划的新闻话题“暴走妈妈陈玉蓉割肝救子”获得中国新闻奖提名奖，新闻当事人陈玉蓉获“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09年，我加盟武汉百步亭社区，担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同年，全国社区志愿服务现场观摩会在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召开，吹响了全国学习百步亭模式，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的号角。2010年7月，



于天宝（左四）获评2022年度江岸“最美科技工作者”

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正式成立，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网成功上线。通过这种方式，将网络传播与志愿服务相结合，走一条立足武汉辐射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任命我为总站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网编辑部主任。

2018年6月，辅导过三家独角兽企业的我不甘寂寞，“亲自”下场创业，掌舵众创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旨在为政企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新媒体产品定制服务，更便捷的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管理工具，更开放的数字内容服务共享平台。

创业初期，我们以数字创意与数字传播作为起点，从一支只有十几名小编的队伍扩大到有专职创意策划、专门的原画师、专职摄像剪辑、专职后期制作的三十多人团队。我们协助有关部门加强政务新媒体运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团队力量，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务新媒体平台，在互联网世界传播“政能量”，搭建政府市民的“连心桥”。到现在，我们协助运营的政府新媒

体60多家，总粉丝量1200多万，精彩作品频出，年均总浏览量已突破2亿人次。

2019年6月，尝到数字经济甜头的我们快速扩大公司经营范围，将公司的发展目标定位为“数字赋能专家”。在原有数字创意与传播业务的基础上，成功拓展了系统集成与开发、数据治理与应用两大领域。一年内，我们就先后开发并布署了政府网站监测平台、政务新媒体监测平台、属地App监测平台、国产化行政审批系统等20多套产品。同时，我们还深入工业互联网领域，赋能实体经济，运用数字孪生技术为行业龙头企业服务。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服务百姓民生；支持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2020年，公司承接了武汉市“民呼我应”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数据分析工作。“民呼我应”整合了“市长专线”“城市留言板”“武汉微邻里”“数字城管”等多个平台的数据资料，是武汉知名度最高的网上民情窗口。公司对“民呼我应”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定期形成周报、月报等

各类分析报告。以数据赋能城市治理，为政府全面监督管理提供依据，让城市治理和服务更加精细精准。

2022年，公司与武汉一家激光龙头企业签署协议，就数字化升级改造达成合作。在已完成的一期项目中，公司通过“数字孪生”可视化解决方案，将机器的全套操控流程“克隆”至平板电脑，实现了可看、可控、可交互，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客户高度肯定，被新华社作为典型报道。

2022年5月份，《武汉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2—2026年）》正式“出炉”，提出力争到2035年，建成国内重要的数字经济技术策源地、数字产业集聚地，建成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成为武汉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力支撑。

让“武汉真相”回应武汉谣言

2020年1月23日，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英雄武汉宣布暂时关闭离汉通道。当所有人选择赶紧回家，我选择了未知的逆行



于天宝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筹措物资

之路。睡沙发，吃泡面，冷水澡……在办公室60多天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情，令我永生难忘。

为了筹措物资，我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通讯录里十几年没联系的外地同学和朋友，都被我翻出来向他们电话求助。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八个字饱含的深厚感情。电话另一头，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响应了我的请求，千方百计筹集物资。有段时间，每天都有大量物资通过快递定点运送到公司楼下。由于缺乏运力，电梯又暂停使用，我只得将物资一点一点扛到公司存放，再联系相关单位来接收物资，或抽空亲自运送上门。好在街道和社区给我开了通行证，市委网信办给我开了车条，出门比较方便。前前后后，我募集、捐赠和发放的物资有20多批，总金额超过500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稳定人心、科学防疫是重中之重。由于人们都居家隔离，更多地依赖网络获取信息。网络舆情成为影响民众心态、看法和行为的重要变量，舆论场

成为重要的战“疫”阵地。舆情疏导及时、风清气正，则有利于汇聚人心，齐心协力战胜疫情；舆情导向混乱、各种信息嘈杂，则将直接影响民众的“战疫”心理，在疫情面前产生恐慌和无力、无措感。逆行的两个多月里，整个公司也投入到科学防疫的各项宣传和舆情引导工作中。为及时推出疫情相关的视频短片，公司同事们虽隔离在家，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主动加班，没日没夜地干。就这样，在防疫

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制作了1集《依法防疫宣传片》、22集《防疫科普宣传片》、33期《防疫辟谣宣传片》，利用短视频通俗易懂、传播快速等特点，进行疫情科普、辟谣，有力提高大家的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

我们还主动担负了“疫情防控志愿者在线招募平台”“方舱医院信息系统”“疫情防控智能测温系统”的开发工作。其中，48小时就完成志愿者招募平台的开发、测试和上线工作，平台上线5天内，就有5万人集中注册，满足了当时志愿者招募的需求。

白天搬物资，晚上做方案，和同事们视频会议，远程协作，经常忙到半夜……这期间，我见到了各地医生们舍生忘死治病救人，见到了社区干部志愿者无私奉献坚守岗位，见到了环卫工人不顾安危冲在一线……我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她付出和守候，我也试图用自己的一点微光照亮这座城市。

聚集人才助推公司发展

有人问我，如果生活有苦也有甜，你是想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我的回答是，人生的苦就是甜，因为只有逆境才让你不断成长；人生的甜就是苦，因为舒适环境让人麻痹退步。创业这几年很苦，但也很甜，除了自己不断成长，还有一批优秀的人才聚集到了众创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张永敢是一名90后青年，在招才引智政策的吸引下，在公司愿景的感召下，放弃了北京户口、事业编制，孤身来到武汉。他每天与客户密切沟通，掌握需求与痛点，定制产品和服务方案，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率先当选公司副总。曾经就职于互

联网大厂的罗丞、就职于世界五百强的王文静、就职于省级媒体新闻中心的罗伟、毕业于法国的留学生何惊、产业经济研究员张永红……武汉的政策优势让青年人心向往之，众创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成了年轻人圆梦的地方。我不孤单，因为有“创友”相伴！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众创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政务软件系统在22个政府部门部署应用，不断满足政务软件国产化的需求，得到了所有客户的一致认可。经过多年深耕，公司研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行业龙头企业——锐科激光落地开花。公司推出的众源云惠民充电站，安全可靠、便捷实惠，真正做到了“让电动车下楼，让安全感上楼”。公司正在研发的“乡筹云”，秉承“三乡工程”理念，运用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赋能。

人生有很多种选择，我选择了武汉，选择了创业，选择了一往无前。一路走来，虽然我创业带队已有多多年，但始终带着母校情结，喜欢研究和探索。研究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前沿技术。直到现在，我还坚持在高校教学，经常带着学生们做各种科研课题。当然，育人是一个课题，创业也是一个课题，人生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一步步脚踏实地前行，不断破题，不断升级，与武汉共同成长。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倾注在每一天的工作中，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幸福。大武汉，一定让我们不负年华！

汉口西商跑马场图史

◇ 侯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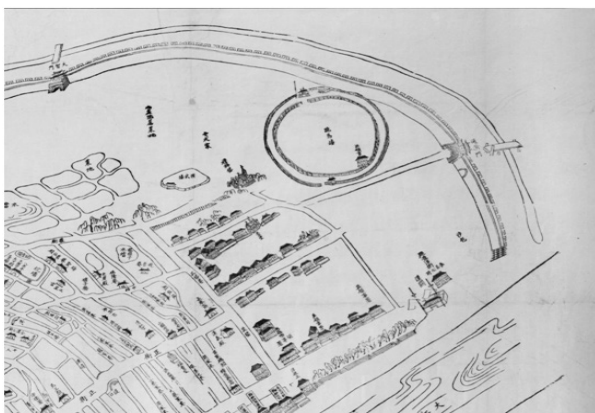
1861年3月,英国人在汉口开设租界后,带来了他们喜爱的跑马博彩。1877年即在汉口城堡内兴建跑马场,民间也称马道子。

1902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主持,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及农民手中,购买了汉口城堡外后湖的800余亩土地,再建跑马场。按今天的方位测定,这块地“东起永清街,南濒解放大道,西连解放公园,

北邻惠济路”,今天的解放公园不过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二。

跑马场名为“西商跑马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由于除英国外还有法、德、俄、日、比共六国参加,又称“六国洋商跑马场”。

武汉解放后,洋人的乐园回到人民手中。城堡内外跑马场的历史印迹,都由一组打捞而出的老照片诉说过往。



1. 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在汉口通济门、沙包(今一元路一带)地域,标注有跑马场。



2. 清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的明信片(迄今发现最早的跑马场照片),在中国亭阁式建筑前聚满了洋人,背后左边可见汉口城堡,墙垛上站着看热闹的华人。



3. 1889 年左右，跑马场建筑已变为有双层回廊、凸型外廊楼梯的西式建筑，底层门洞上方写有“PARI-MUTEL”（同注分彩）。



4. 现江汉关博物馆陈列的照片，说明为“1905 年以前汉口城堡内的老西商跑马场，位于今珞珈山街至一元路间”，主体建筑已更改扩建，更具西洋风格。



5. 1905 年汉口城堡外跑马场建成的主看台、公证庭等初期建筑。公证庭为二层钢木结构，上层为裁判人员监视赛马全程之处，下层为用于摄影之处。



6. 进入跑马场公事楼（办公楼）的道路，路旁设置的中英文木牌上写有“此路纯系本会会员私路”。该处看似将路权做了会员与非会员之分，实际是洋人与华人的权利之分。当时，西商赛马体育会的会员为洋人，华人很难加入，就连为跑马场提供大量土地的“地皮大王”刘歆生也不例外。

7. 骑马的印度人为跑马场警卫，屋顶飘扬的旗帜上写有三次获得香槟赛（冠军赛）头马的名字，一直到下届头马出现时更换。



8. 跑马场后进行了扩建，扩大了公证庭前主看台，场内增设了18洞高尔夫球场和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酒吧等，跑马场成为西商赛马体育会的一部分。



9. 跑马场看赛马也有待遇之分，公证庭旁是全场视角最好的地点，这里设有洋人藤椅专座，四周设有木栅栏，只准洋人会员入内，曾有一位华人高级买办欲入内时，被印度警卫脚踹羞辱，激起华商义愤，因而自办华商跑马场。



10. 西商跑马场兴办之初，没有华人的看台，虽有清代官员乘轿而来，也只能在外场看个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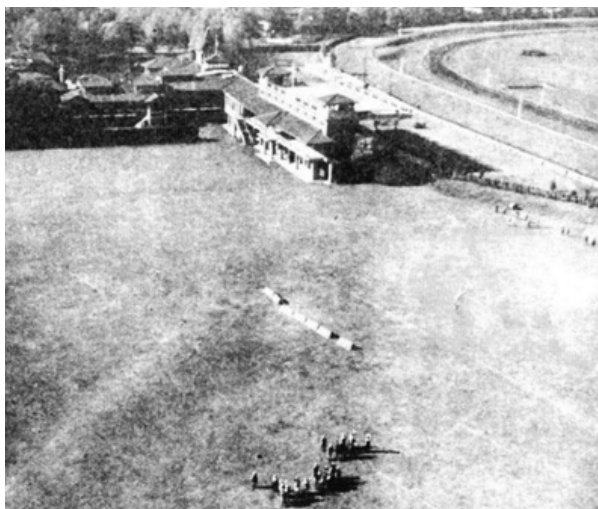
11. 每当赛马季，跑马场外栏杆聚满看热闹的华人，郊县农民纷至沓来摆摊做生意。



12. 后来，跑马场在看台东侧设了一座 2000 平方米的看台，供华人观赛和赌马。



13. 赛马期间，跑马场一天的收入可达 20 多万银元，洋人挣得盆满钵满，普通赌马者却不幸运。汉口人有段“赌马歌”：“一进马场，喜气洋洋，谈的是汉风（马名），说的是庄王（马名）。马下跑道，输得精光，拿的是会钱（旧社会的标会），当的是衣裳。再下马场，男盗女娼！”。



14.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跑马场，没收全部财产，并在场内构筑高射炮阵地。1945 年抗战胜利，这里成为国民政府遣返日本战俘的集中营。1946 年英国人重新接管跑马场，但一直没举办赛马博彩。



15. 1949 年武汉解放，跑马场建筑拨给中南戏剧学院、人民艺术剧院等使用，现为武汉歌舞剧院、武汉楚剧院等所在地。

侯红志，原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